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2/556
16 September 1987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四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保护智利境内的人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转交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 1987 年 3 月 12 日第 1987/60 号决议第 12 段编写的初步报告。

* A/42/150。

附 件

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初步报告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 导言	1 - 7	3
二、 访问智利	8 - 53	4
三、 特别报告员的其他活动	54 - 72	16
四、 关于侵犯人权的控诉	73 - 75	21
五、 结论	76 - 120	55
六、 建议	121 - 132	65

一、 导言

1. 自1974年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大会一直在审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也讨论了这一项目。

2. 人权委员会按其1979年3月6日第11(XXXV)号决议，任命了一名特别报告员调查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随后，委员会在1980年2月29日第21(XXXVI)号决议中又请特别报告员将智利境内的失踪人员问题列入其报告内。

3. 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依次是：阿卜杜拉耶·迪埃耶法官（塞内加尔）、拉吉苏默·拉拉赫法官（毛里求斯）和1985年2月1日上任的本届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多·博略·希门尼斯教授（哥斯达黎加）。

4.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份初步报告后，于1986年12月4日通过了题为“智利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的第41/161号决议。在第10段中，大会请人权委员会“深入审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并在考虑到其掌握的一切有关资料的情况下，采取最适当措施以促使有效恢复智利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并要求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5. 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智利境内人权情况的第四次报告（E/CN.4/1987/7）。委员会在1987年3月12日第1987/60号决议第12段中决定“…把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他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关于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的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随后认可了此决议（1987年5月29日第1987/152号决定）。

6. 特别报告员按照上述各项决议，谨此提出1987年关于智利人权情况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他本人的第5次报告。这次，他获得智利政府的第二次批准，

给予他全部的行动自由，因此他能够对情况作直接分析，并获得政府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充分合作，向他提供了有关智利的人权状况的证词和文件。他根据智利批准的各项国际文书内所规定的规范和被公认为普遍实用的其他国际人权法的规范的规定，并根据他对智利情况的了解，对智利境内的人权情况进行了分析。

7. 本报告的主要内容涉及1987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但是，视案件的性质，有些在这个期间以前或以后获得的资料也列入一并考虑。

二、访问智利

8. 特别报告员在三名人权中心的官员的陪同下，于1987年3月21日星期六抵达智利的圣地亚哥。他得到外交部高级官员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代表的接待。随后，他同各新闻机构的代表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他在智利停留了10天，在这段时间中，他有一个非常忙碌的日程。

9. 在他于1985年12月第一次访问智利时，特别报告员获得政府的充分合作以及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在计划工作方案时也拥有充分的自由。智利的人权机构所提供的合作、驻在圣地亚哥的拉美加勒比经社会总部所提供的协助、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对特别报告员访问智利期间对他活动所提供的报道都对他的任务的成功完成作出了贡献。

10. 在其工作计划中，特别委员会列出了四个城市：圣地亚哥、科罗内尔、康塞普西翁、瓦尔帕莱索。他同正式组织举行了32次会议，会见了69名官员，包括两名部长、3名副部长、警察局总局局长、警察局情报部部长、监狱总署署长、选举事务部部长、以及内政部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成员。他还同一位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基本法令的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外交部和内政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他还获得最高法院主席、3名审查法官和两名军法检察官的接见。他访问了四个城市的7所监狱，并获得圣地亚哥和康塞普西翁两城的大主教和两名天主教主教、1名浸信会、2名大学校长的接见，并且同关于移民政府间委员会和浸信会主教国际红十字会驻圣地亚哥代表进行了会谈。他总共会见了代表77个智利的人权、

社会、专业、工会以及社区组织等77个集团的261名各界人士。最后，特别报告员还接见了82名以个人身分向他表达意见的人，这些人是从更长的名单中选出的，因为他没有时间同所有的人见面。总的来说，特别报告员在智利一共访问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385名人士。

11. 3月21日星期六的下午，特别报告员获得圣地亚哥大主教和他的助理主教的接见，向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关人权的问题，包括紧急法、驱逐出境、酷刑、单独禁闭罪犯、军法检察官的行为以及团结共济会会长和工作人员在进行他们的活动时所遭遇到的困难等问题。

12. 其后，特别报告员还获得外交部长的接见。外交部长重申智利政府同他合作的意愿，不过，智利政府认为，联合国对智利的人权问题的做法带有歧视和缺乏客观性。部长认为关于酷刑的指控是不实的，并且，如果保安部队对某些事件采取了暴力，那是因为他们是在同恐怖主义者进行斗争。

13. 3月22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圣地亚哥的办事处。他们对政府最近容许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访问因政治活动或颠覆活动而被逮捕的人员（目前约有47名人）的执行状况进行了审查。他们表示，希望今后能够访问被单独禁闭的犯人，并指出，政府应指示中级的保安部队官员不得对犯人进行体罚或虐待。

14. 其后，特别报告员接见了全国反对酷刑委员会的两位代表；两人对360名“政治犯”在智利各处进行的一场绝食运动表示关切。他们并呼吁让Arturo Gion Vargas医生回国。

15. 其后，特别报告员会见了代表11个促进和维护人权的智利民间组织的20名代表，旨在向他们说明他的工作计划。这些代表对于智利的法律和有关人权的国际法规范之间所存在的明显矛盾表示关切，并且对一些驱逐出境的案件以及“政治犯”绝食的案件——其中有10人已经绝食达25天之久——表示关切。他们还还对司法机构在某些涉及主要人权问题的案件中所采取的不合法的行动以及有关对某些被控走私武器和突袭总统车队的人实行酷刑的指控表示关切。

16. 在当天快结束的时候，特别报告员获得内政部部长的接见，同时在场的还有内政部长的机要秘书和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特别报告员向内政部长表示了下列各方面的关切：回到民主制度的进程，紧急状态法令的适用范围，司法部门未能替人权作出适当的保障，私人武装部队的活动，遣送出境，新闻界的局势，以及有必要对保安部队的中级干部发出指示，令他们不得使用暴力。在答复时，部长重申智利政府愿意合作的意愿以及它对侵犯人权案件的憎恶态度。最后，部长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以便对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四份报告中的建议进行分析。

17. 3月23日星期一，特别报告员同下列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劳工部副部长，发展和社会福利部副部长和卫生部副部长；这些人分别向他介绍了他们有关部门内的活动。其后，他又会见了内政部的顾问律师并同他们一起审议了一些关于侵犯人权的控诉案件，这些案件已经提交法院审理，不过特别报告员将这些案件转交给政府，请其提出评论。其后，他同内政部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的六位成员一起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分析：驱逐出境的问题，保安部队的中级官员非法使用暴力手段，任意逮捕和向平民住宅进行大规模突袭等。特别报告员表示，他希望委员会的权利能够予以加强和扩大，特别是在监狱中的酷刑问题和失踪人口问题方面。

18. 特别报告员还访问了团结共济会，同其会长、执行秘书、法律部负责人以及八位律师进行了会谈。他们讨论了下列有关人权的问题：酷刑、驱逐出境、在紧急状况下缺乏有效的司法程序来保障人权，以及其他看起来好象是蓄意制裁人权组织的事件，包括共济会会长本人。他们还讨论到下列问题：军人干涉大学教育、《官方日报》没有出版、《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私人武装部队的活动、在监狱中没有区分“政治犯”和一般罪犯等。关于司法机构，他们注意到：一些最重大的人权案件都没有获得任何进展，指定“代理法官”的办法，军法体系的范围过大，以及下列不合司法程序的行为，包括拘留时间过长，单独禁闭，以及审讯时只根据臆测之词或不合司法程序所取得的供词。军法制度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情况看出：在1986年间受审的260人中，225人受到军法审判，35人是用民事法庭处理。最后，他们还注意到特别任命的军法检察官的一些不合程序的

行动，特别是一位名叫 Fernando Torres 的特任军法检察官的一些行动。

19. 特别报告员最后还在该日会见了六位来自政治犯亲属协会的代表，三位来自被捕失踪人口亲属协会的代表，以及四位来自因政治理由被迫受害者的亲属协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向他介绍了他们各自的组织的关切问题。他还接见了十九名以个人身分来访的各界人士，这些人向他提到九件暴毙案件，十四件驱逐出境案件，八件酷刑案件和一次抄家案件。

20. 3月24日星期二，特别报告员获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接见，并向他介绍了大学的情况。然后他访问了全国保卫和平协会的总部，这个协会是为了协助受恐怖主义迫害的受害人而设的。他在该处见到该组织的负责人，并听取了十位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受害人中四名受害者的证词。

21. 接着，特别报告员获得最高法院院长的接见，互相就下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司法独立的问题，紧急状态的范围，尤其是禁止享有某些权利，以及暂时撤销了受《宪法》第二十四条所保障的权利。在会谈结束的时候，特别报告员重申他想要会见最高法院法官团的意愿。院长表示愿意向其他法官转达这个意愿，并在特别报告员在场的时候进行联系，但是由于法院正在审理案件而作罢。不过，他愿意在隔一天作出答复。但是，法官团最后决定不接见特别报告员，理由是特别报告员曾经在回答新闻界问题时说智利的司法制度是不独立的。

22. 特别报告员随后又到智利人权委员会的总部进行了访问，在该处他见到了会长及三位资深成员。该会表示对下列侵犯人权的情况特别关切：酷刑、驱逐出境和某些政治罪行显然不受到任何惩罚。他们还指出，司法机构的被动态度，行政当局的压力，以及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来污蔑反对派的政治领袖，军事司法当局在审讯以前进行秘密调查，公民大会的领袖被判刑，以及目前行使的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关于紧急状态的基本法令限制了政治结社的权利等。他还会见了人权委员会在利纳雷斯办事处的两位代表，他们谴责该城市中的半军事集团的行动，并指控一位年青人于1985年6月26日在圣雅维尔失踪的事。委员会驻科皮亚波的主

席当时也在场，他说，1986年9月25日他的家也曾经是一个半军事集团炸弹轰击的对象，而这是发生在他本人受到该市市长的攻击（1986年5月26日）和提起对该市长的控诉之后。委员会驻兰卡瓜的主席也指出，在该市的监狱中，有9名“政治犯”声称遭受到酷刑。3名委员会来自库里科的代表说，他们不断受到武装帮会团体的威胁，而他们要求司法保护的申请却毫无下文。他们认为，应当向保安部队的中级干部发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他们不得滥用职权。特别报告员在结束他访问委员会的工作时听取了三个人的证词，他们向他报告了27件酷刑案件，一件任意逮捕案件和一件恐吓案件。

23. 当日的晚上，特别报告员听取了下列人士的指控：三位来自大学生家长协会的代表，四位来自秘书同业工会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三名 Agrupacion Jose Santos Lincoman de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Huilliche 的代表、三名民主运动的代表和四名要求让流放者回家委员会的代表，这些人向他提供了许多个别案件的资料。最后，快到半夜时，他与七名以个人身分到访的人进行了会谈，这些人谈到流放的情况，以及在圣地亚哥、圣安东尼奥和瓦尔迪维亚的监狱中犯人受到虐待（三个案件）和酷刑（三个案件）的情况。

24. 3月25日星期三，特别报告员访问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各个办事处，同委员会主席、其他18人会谈。6人谈到智利法律、政治的总形势，军事审判制度上的非法行为，例如，依靠执行单位来组织，审判进度缓慢，很难保释待审犯人，据说特别军事检察官费尔南多·托雷斯处理军火走私和偷袭总统车队案件违法乱纪（单独禁闭期延至35天，违反审判前保密，针对被告设监禁制度），对上述犯施酷刑。至于所谓的“政治犯”，据说，1987年2月底，智利有449名政治犯，只有65人被判，其余384人仍在坐牢等待审判。

25. 不久以后，调查法官卡洛斯·塞尔达接见了特别报告员。他说他接到匿名恐吓，甚至最高法院都因为他在调查10宗失踪嫌疑案之后作出的决定而对他采取纪律处分。1986年8月14日，塞尔达对军队和保安部队里涉及胁迫罪和非法剥夺自由罪的人员作出拘留决定。他认为，这些罪行尚未解决，不得赦免，即除非

证明罪行已结束，否则没有止境。高等法院取消了他的拘留决定，宣布赦免法令。他的接班人永远打回了该案件。

26. 其后，特别军事检察官费尔南多·托雷斯和埃尔温·布兰科在其各自的秘书陪同下接见了特别报告员。前一位检察官曾经调查过军火走私和军火囤积、偷袭总统车队和突击劳塔罗面包店等事件（“共济会案件”）。据他说，因军火走私和军火囤积案拘留者中有6人在电视上承认参与有关活动。检察官对指控他施酷刑的事情表示他知道巴西里·卡里略·诺瓦身体衰弱，而且他也延长了单独闭禁期，因为有新发现，需要调查。另一方面，他承认向新闻界透露消息，违反审查前调查保密的作法。关于突击面包店的事件，检察官托雷斯控告两名医生和一名律师同团结共济会共谋采取恐怖主义行动。起诉的理由是，他们没有把他们医治子弹负伤者的事实报告警方。两名医生被扣留在防范性拘留中心。另一名检察官在调查致使罗德里戈·罗哈斯·德内格里烧死的事情及卡门·格洛丽亚·金塔纳·阿兰西维亚烧伤严重的事情。他表示，调查结果并未发现使用不必要的暴力。根据行政审查结果，被指控应对事件负责的巡逻队队长穆尼奥斯上校未向他的上司报告事情的发生。这一失职行为受到处分。

27. 警察总局局长也是执政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在八名同事的陪同下接见了特别报告员。具体报道了警察部队的组织情况和活动。至于属于已解散的警察局通讯部的警察部队，说他们参与绑架智利教师同业公会的一些领导人及绑架谋害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曼努埃尔·格雷罗和圣地亚哥·纳蒂诺（发现其尸体颈部割裂）一事，局长表示他的警察部队决没有参加这些事。他还说他不同意调查法官何塞·卡诺瓦斯对绑架教师公会领导人的案子作出延缓审判的决定，因为这样好象暗示警察部队内部同其秘密兵营有非法的勾结。

28. 接着，特别报告员同正在调查上述一段事件的调查法官何塞·卡诺瓦斯·罗夫莱斯会晤。他表示调查结果显示警察通讯部参与了有关事件。国家情报中心的报告有载述。他强调，在他调查期间，警察部队和侦缉局没有给予他必要的合作，

他还连续不断地接到死亡威胁和监视；甚至还试图通过一项特别法律来阻止他进行调查。

29. 不久以后，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圣地亚哥原公共监狱的卡普奇诺增建部分。监狱总署署长接见了他并告诉说，大约有444人拘留的罪名为“颠覆”罪，其中305人在绝食抗议。他又私下同在团结共济会工作的胡安·马卡亚和拉米罗·奥利瓦雷斯等两位医生分别会面。这两位医生是由上述军事检察官费尔南多·托雷斯起诉的。前者是从1986年6月3日起坐牢的，后者二度拘留，已坐牢100日。

30. 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圣地亚哥原公共监狱，会见了监狱总署署长和狱长。据他们报道，拘留在监狱的这57位“颠覆分子”在绝食抗议，不断要求军事法庭迅速审判其悬案，并要求关在监狱的同一部分。特别报告员私下同自命为“全国政治犯协会”会长率领下的15名绝食者会谈。据称，他们都在早期的行政拘留期间和以后坐牢期间受到侦缉局成员的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和隔离被延缓。其中有一位说他在侦缉局被强奸。他们请特别报告员向有关当局转达其要求。

31. 3月26日星期四，特别报告员同促进和平正义会的三位代表会谈。他们介绍了其组织在人权教育方面的目标。他们表示关注智利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接见了警察部队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是21人（主要是妇女）小组的代言人，他向特别报告员陈述了21人的亲属——都是警察——在值勤时遭恐怖分子偷袭杀害的经过。特别报告员接着又会见了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基本法令问题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谈到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登记投票的过程。他还会见了铜矿工人联合会的两位领导人。后者表示他们曾要求政府批准关于工会自由的国际劳工协定。他们还表示关注恐怖主义和民众“抗议活动”政治化。他们说，抗议活动不是工人召集的。属于所谓 SOFOFA 工业家组织的两名商人向特别委员会保证“抗议活动”为政治性罢工，据称智利的经济形势在那时候大有改进。以个人身份会见特别报告员的另外两人告诉其双亲遭恐怖分子袭击死亡，据说保安部队参与这次袭击。

32. 经政府任命的智利大学校长接见了特别报告员，向他介绍智利大学的情况

和军队参与的程度。特别报告员表示不同意任命军人当校长的制度。他向大学学生讲话时再度提到这一点。特别报告员拜访了警察总署署长，向他转达了进行绝食抗议的被拘“颠覆分子”提出的要求。署长说他会仔细研究这些要求，并同有关者讨论。随后，特别报告员走访了选举事务局的办公室，有局长和同事接待，了解了登记投票的过程、即将执行任务的新的最高选务法庭及不久将通过的《投票选举法》和《选区法》。

33. 特别报告员访问了 LO HERMIDA 贫民窟，有一名主任马里奥·梅希亚斯和一名神父赫拉尔多·威兰接待。该名神父提供圣母堂作集会的地点，许多居民都到圣母堂参加集会。有十九人代表七个组织在会上向特别报告员报道保安部队突击贫民窟的情况、失业问题、贫民窟缺少保健诊所（有 68,000 居民），其他有关新的保健制度的问题、发给幼童的牛奶减少、设立了 12 个社区施食处供养 750 个住户、缺少住房、目前的住房拥挤、教育问题和年轻人问题。

34. 特别报告员又回去原公共监狱，同前天请求他把他们提出的要求转达有关当局的三名绝食者私下会谈。他向他们报道了拜访警察总署署长的情况，转达后者愿意按个案处理问题。

35. 同日，特别报告员在午夜后同保护紧急状态受害儿童基金会的三位代表会谈。该基金会向基本权利或其父母的基本权利受损的儿童提供医药、心理和教育援助。幼儿教师协会的一位代表也来会见特别报告员，称说她因为提出反对政府的看法而被开除。贫民区联合委员会的两位代表说，国家情报中心威胁他们，甚至对他们施酷刑。专业协会联合会人权部门的四位代表报道了公立学校解雇成批的教师，他们认为这是法院“胆怯、优柔寡断”及军事法庭“不独立”所致。他们又指控，监禁在圣米格尔监狱的一名女政治犯被虐待。最后，另有五人以个人身份出现。他们谈到亚历杭德罗·皮诺于 1986 年 7 月在阿里卡失踪、在圣地亚哥三宗暴毙案、两宗威胁案、亚里卡卡门教堂的爆炸案。

36. 3 月 27 日星期五，特别报告员在外交部同外交部的两名高级代表和内政

部的两名代表举行工作会谈。会谈是根据同内政部订下的协定举行的，即成立工作组来研究特别报告员至今就智利人权情况所提四次报告中所作建议的执行情况。特别报告员在会上强调应扩大内政部人权咨询委员会的职权，特别是针对嫌疑违反人权的司法控诉。他还建议不断审查国际红十字会和保安部队就允许红十字会官员探望列为“颠覆分子”囚犯一事达成的协议的执行结果。红十字会官员应能同单独监禁的囚犯私下见面，唯一的目的是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报告员还要求《官方日报》登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快完成宪法的发展及应修订有关紧急状态的法律，特别是有关法庭保护人权的法律。最后，他表示政府应该在行政和司法调查暴毙和其他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上更积极地合作。

37. 其后，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基督教社会援助基金会（基督教社援基金）的办事处，并受到五位基金会领导人，包括两名主教的接待。该组织是对因政治原因而受拘禁或迫害者及其家属提供社会、心理和法律援助的机构。他们强调使用法律渠道（第504号法令）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渠道可把监禁判决改为放逐。他们又表示，1986年12月31日八名蒙面穿制服的小组袭击移徙问题政府间委员会，对18名工作人员造成了心理影响。特别报告员后来在圣地亚哥从迁移政府间委员会代表处证实了此事。

38. 特别报告员其后访问了圣米格尔预防拘禁中心；他访问了监狱署官员，并得知有33名妇女因“颠覆”罪被禁在狱，其中21名在进行绝食抗议。关于他们的案情，据称31名均未受审即先拘禁，仅有两名已判罪。特别报告员接着私人会见了五名由他自选的女犯，她们申诉了绝食的理由——正好与那些自称的“政治犯”的理由相同——以及她们的拘监状况，在拘监中他们受到各种形式的肉体压迫，其中一人被强奸。

39. 特别报告员又访问了前圣地亚哥监狱，受到监狱署官员的接待，官员告诉他，狱中115名“颠覆”犯进行绝食抗议。特别报告员随即选了四名犯人作私人会见，听取了绝食者的要求，要求内容与其他刑罚机构的受刑人要求的内容相似，并

听取了他们各个人被拘禁的经过，他们均声称遭受肉体压迫，包括在拷问时受到电刑。

40. 特别报告员最后在当天午夜时会见了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保民权委员会）的六名代表，他们告诉特别报告员，波里斯·维拉·塔皮亚在1986年7月2日被兵士枪杀，塞乔·鲁兹·拉佐于1984年12月在圣地亚哥失踪。他们又要求他提供援助，就被拘在智利监狱的塞乔·圣地亚哥·果多·弗里蒂斯的案子适用第504号法令。他也听取了智利大学学生联合会两名代表，保卫青年权利委员会（保青委员会）三名代表，莱西奥·韦库纳·麦肯纳成人教育学生中心五名代表和全国餐厅、旅馆、饮食工人联合会四名代表的报告。其后，他会见了九名个人名义人士，报告了一件暴行死亡案，六件放逐案和两件要求国内放逐案。

41. 3月28日，星期六，特别报告员前往康塞普西翁，拜访康塞普西翁的主教办事处人权部，其后会见了该部的四名主任和律师。谈到关于采取司法行动的问题，他们表示，民事法院在处理保护宪法权利的要求时行动十分迟缓，一尽管法定期限是24小时一部份原因是所涉安全机构不肯合作；部份原因似是由于程序原因和缺乏保证。他们表示，所说的酷刑涉及国家情报局，过去一年，地区的警察部队酷刑案已有所增加。他们说，军法已过份扩大至损害到民事法庭，更加强了政府的利益。在提出论据时他们指出，去年一年该地区即有87人因政治理由受审判，其中72名在军事法庭受审。他们又说，一件案子可同时在两种法律下起诉（武器管制法令和反恐怖主义法令）。他们又表示，曾见到警察与军事检察官串通不利于被拘禁者的利益。

42. 特别报告员又前往科罗内尔城造访一座前公共监狱，受到监狱署区域主任和该市市长的接待。他随即前往六名妇女被监禁的地方对她们作了私人访问。按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均自称是“政治犯”，其中五人在进行绝食抗议，她们的要求与其他同类犯人的要求相同。她们均表示受到酷刑，在拘禁初期审讯时受到电刑。

43. 回到康塞普西翁，特别报告员又前往拜访一所前公共监狱，受到监狱署官

员的接待。他挑选七名“颠覆”罪的拘禁者进行了私人访谈。他们都说曾遭酷刑，在拘禁之初期受审讯时包括被用电刑。他们表示，他们属于自称的“政治犯”集团，该区域内有49人进行绝食抗议，提出的要求与前此访问的囚犯集团成员所提的相同。

44. 过后不久，特别报告员受到康塞普西翁主教，蒙辛略·桑多斯的接待，谈到其教区内一些公然侵犯人权的问题。

45. 特别报告员随后在康塞普西翁会见了智利人权委员会的三位代表，他们向他报告了关于军事检查官的行动，以及对学生兰道夫之死一案的司法调查毫无进展。康塞普西翁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总部的五位代表也表示了他们对军法扩大的忧虑，他们表示，军事司法中没有规定罪行等级原则或最高法院的复审原则，而只有申诉的补救办法。因此，军事法庭对个人受审判或拒绝其保释的决定是不能上诉的。他们又表示，军事法庭出庭的律师一般皆不得介入审前司法程序，同时，他们认为军事法院未能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外，圣地亚哥的军事法庭（这是全国唯一的军事法庭）对申诉的补救又都多方拖延；法庭的组成又是三名军职法官两名民职法官。

46. 特别报告员又在康塞普西翁接见了智利教师专业联会的两名代表和大学教师的六名代表，他们谴责1987年1月和2月发生的1,481名教师集体失踪的事件和对教师工会领导人的威胁事件。他们报告说，失踪案显有政治动机。接着又有学术界联合会两名代表和康塞普西翁大学学生联合会两名代表发言，他们表示反对在大学内的军事干涉，随后，国内放逐者协会第八区的一位代表斥责对某些协会会员的骚扰活动以及对反对派领袖克劳多米诺·阿尔梅达的行政放逐行动。最后，特别报告员接见了两位人士，他们以个人身分报告了四件据称的酷刑经过。

47. 特别报告员于3月29日，星期日，到达瓦尔帕莱索城，在当地探访了智利人权委员会的地方办事处，会见了委员会瓦尔帕莱索办事处的四位领导人和比尼亚德尔马城委员会办事处的两位代表。他们谈到费德里科·圣玛利亚技术大学几名学生因据闻参加运动反对该大学中的军事干涉而遭到绑架和据报的酷刑。他们又报告说，当地天主教区和教会，人权委员会领袖和技术学院以及卡谬斯主教本身

均遭到骚扰。学术界联合会的一位代表和费德里科·圣玛利亚技术大学学生联合会代表也作了相同的控诉。瓦尔达帕莱索师范学院的三名代表斥责了该地区因教育私有化后1112名教师集体失踪的事件，并称他们的领导人已受到生命威胁。

48 “政治犯”亲属地区协会的三名代表也往见特别报告员，表示对区域中监狱内囚犯绝食抗议的关切。其后，下落不明的被拘禁者家属协会的三名代表向特别报告员报告了玛利亚·伊莎白·古德里兹·马丁内兹和其他七个人的失踪案；此案事实虽已呈送法庭，但迄无任何动静。瓦尔帕莱索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六名代表提出了对军事法庭行动的控诉，并报告了自称的“政治犯”的情况，六名印地安妇女和其他14名普通犯人在基略塔监狱被囚在拥挤不堪的狱室的情况。和平与司法处区域部门的三名代表指出，公民缺乏政治参与，甚至小镇的居民委员会也是由行政当局指派组成。最后，保卫青年权利委员会区域部门的两名代表表示，对去年大批学生被强制拘禁十分关切，这些学生中有些是在因违反大学校规而受到虐待或惩罚。

49. 其后不久，特别报告员前往视查了瓦尔帕莱索前公共监狱，会见了监狱署的官员，这位官员证实该处狱中有54名“颠覆”犯，正在进行绝食抗议，支持全国一级团体提出的要求。54名拘禁犯中有51名在等候审判，三名已宣判。特别报告员随即选了四名进行私人访问，听取他们叙述拘禁经过，他们的要求和拘禁早期的情况，审讯时受到的虐待等情况。

50. 3月30日，星期一，特别报告员在圣地亚哥第二次受到外交部长的接待，他表示感谢政府的合作以及他访问期间受到的帮助。他随后也第二次受到内政部长的接待，他再次表示感谢在政府的合作下完成其任务，并重申他认为应加强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签订的协议，内政部人权咨询委员会的权力应包括对非法压迫的控诉。他又将他致送委员会主席的信的内容告知了部长，信中内容系为29名被行政决定禁止入国境的人辩护，他是根据收到这些人亲属的申诉写信的。

51. 特别报告员又拜访了侦缉总局局长，他向报告员提出了关于恐怖主义行动的全面报告，以及在卡里扎尔·巴诺发现的武器隐藏窖，据称这是用来企图行刺共

和国总统并武装约2万到3万名城市游击队的。署长又指出，侦缉总局隶国防部，对移徙问题政府间委员会办事处的攻击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司令部所为。

52. 特别报告员接待了全国劳工指挥部的两名领导人，他们告诉他最近成立的工人法庭毫无作用，《劳工计划》是为阻止自由组织工会而定；失业率的真实数字占活动人口的22%，其中包括《最低就业方案》和《户长就业方案》的工人在内。他们又说，最近的《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关于政党的基本法令》是对工会领袖的歧视，目的在使他们变成不符政治活动的规定标准。特别报告员又听取了全国生产贸易联合会主席对智利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非常鼓舞人心的谈话。

53. 最后，特别报告员前往飞机场，离境前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并由外交部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资深官员送行。

三. 特别报告员的其他活动

54. 考尔德伦大使于1987年5月8日访问了人权中心，并提出一份文件谈到1984年至1987年期间在人权、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方面的改进情况。这些改进情况包括在1987年取消了“戒严状态”和“宵禁”，并允许大量流亡者回国。在文件中还附有一份全部通讯媒介的清单，1984—1986年劳工统计数字和一份基本保健资料的文件，其中包括直到1986年的统计数字。他最后指出，根据特定罪行原则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后，目前由军事法庭审理的大量案件将转交给有关的刑事法庭（普通司法）。这一措施将加快该法所涉及的审判过程。

55. 特别报告员获悉，侦缉局同内政部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于1987年5月12日签署了一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委员会将每天收到一份侦缉局所关押的人的名单，委员会成员将可以采访被关押的人，以确定他们的身体情况和健康状况。侦缉局还将对被关押的人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有一名委员会成员在场，然后再将他们送交司法当局或释放。

56. 此外,《官方日报》1987年3月10日公布了第308号最高法令,根据《宪法》过渡规定第25条,将“扰乱治安危险状态”延长6个月。根据这种紧急状态,共和国总统可将某些人在其家庭或在除监狱以外其他地方拘留5日(如发生恐怖主义行为,拘留期可以延长至15日);可以限制集会权利和新闻自由(关于新出版物的发行);可禁止“宣传《宪法》第8条所提到的各种理论”的人入境或将其驱逐出境;可强行指定(流放)某些人前往某一城市地区,最长为90天。根据过渡规定第24条最后一款,“根据本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除可吁请发布这些措施的当局加以审查外,不负任何追索的责任。”

57. 《官方日报》1987年6月6日还公布了6月3日第715号最高法令,将“紧急状态”在全国各地延长90天,并指定了紧急地区的长官。《宪法》第41条第4款规定,在宣布紧急状态时,可采取适用于戒严状态的一切措施,但逮捕、将被逮捕人从境内一处转移到另一处、驱逐出国以及限制行使结社权利和组织工会权利不在此内。仅可以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官方日报》还公布了6月4日第6,255号最高法令,在“紧急状态”期间对传播媒介进行限制。其中特别规定,传播媒介所登载的新闻和评论不得涉及《宪法》第8条所指明的某些人士、组织、运动或集团的活动情况……以及关于国家安全的第12,927号法令所指明和规定的非法行为(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酝酿或举行公共活动,以及发动或鼓动可扰乱秩序的任何示威游行)。另一方面,第2,655号法令并不禁止报道恐怖主义行为或各政党的活动。1987年4月6日第49号公告撤销了对在都市地区举行政治集会权利的禁令,但公众集会必须得到紧急状态区首长的批准。

58. 1987年6月11日,《官方日报》公布第18,623号法令,部分地修改了设立国家情报中心的第1,878号法令。该修正案规定,国家情报中心根据主管当局的命令逮捕任何个人时,应根据命令规定将其关押在家中或立即送往监狱或拘留所。

59. 特别报告员于1987年6月15日写信给考尔德伦大使,要求提供进一

步情况说明 I O Hermida 贫民区的医疗情况以及医疗和妇幼保健服务的情况。

60. 1987年6月16日, 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在人权中心受到接见, 他们提供了有关所谓侵犯人权的大量文件。 他们还对下列情况表示关切: 对于自称的“政治犯” Carlos Garcia Herrera, 在一审时判决死刑; 他们认为新闻自由受到“进一步攻击”; 三名不同政见者受到行政国内流放; 在最近批准回国的名单中包括两名所谓失踪人士。

61. 最高法院于1987年7月6日公布一项协定, 重申司法对政府其他部门的“绝对独立性”, 指出“司法权受到各种法律的限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独立性的任何损失”, 因为最高法院并不企图审理不在他主管范围内的案例。

62. 特别报告员于1987年7月30日在圣约瑟会见了考尔德伦大使, 他交给特别报告员有关智利人权最近发展情况的文件和资料。 在会见时, 特别报告员对他说, 如能再次访问该国以便了解最新发展情况, 并在1988年2月向人权委员会报告将是有益的。

63. 特别报告员还于1987年8月17日在圣约瑟会见团结共济会法律部部长, 法律部部长向他介绍了涉及重要人权案件的审判情况, 并交给他许多文件。

64. 1987年8月13日, 智利人权委员会和精神压力研究与治疗中心的一名精神病专家访问了人权中心。 他报告说, Mauricio Arenas Bejas 于1987年2月19日在路上遭到射击, 被送到医院以后经过40天的特别护理, 现正在恢复之中, 在此期间, 他被单独监禁, 经过10次审讯, 据称受到国家情报中心人员很大心理压力。 这使他极为沮丧。

65. 同过去情况一样, 特别报告员继续在圣约瑟或日内瓦通过人权中心秘书处受理个人的要求, 这些人要求他同智利当局进行斡旋, 以补救所称的侵犯人权情况。 这些侵犯人权的情况涉及流放在外希望回国的亲属, 涉及显然受到关押、虐待、劫持、威胁或监禁的人士。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 特别报告员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理由, 要求政府提供详细资料。 如果情况属实, 他还要求采取步骤结束上述所报告的情况。 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的某些要求。

66. 特别报告员于1987年9月2日至5日访问日内瓦，以便最后完成本报告。9月3日和4日，他还会见了卡尔德伦大使，智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一等秘书陪同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大使提到关于改革刑事诉讼法的一项法案，目的是简化司法工作并使其更加有效。该法案还将修改指定高等法院“陪审律师”的办法。他还宣布了一项大赦法案，一旦立法程序完成以后即将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将签署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反对酷刑公约。他还提到已停止指派大学军人校长的作法，临时的替代办法是由大学理事会提出3名候选人名单，由教育部作最后任命。关于流放问题，他说最近已将禁止回国的人减少到约464人。关于1987年6月15日和16日发生所谓冲突并有12名所谓反对派被杀问题，他断言，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发生了这种冲突，因为有4名国家情报中心人员受伤，两名被枪击。他还说，在同一期间内，发生了若干袭击警察的恐怖主义活动，还发生有爆炸事件。

67. 1987年9月2日，特别报告员接见了团结共济会司法部的一名人员。他说1987年6月15日和16日的所谓冲突（“阿尔巴尼亚行动”），官方有各种说法，他说据他所知，在被杀的12人中，已对九起事件向法庭提出控诉，因为有充分理由怀疑并没有发生冲突。在此方面，特别报告员于9月3日听取了两名受害人的母亲的痛苦证词，她们希望将澄清事实和讨回公道。上述律师还报告说，Ricardo Campos Urzua自1987年6月24日被关押在侦缉局一分局以后，受到国家情报中心人员的审问和拷打（见下文第4节，案例B.37）。他还对特别报告员表示对如下情况的关切：由军事法庭审判团结共济会的某些杰出人士，对烙刑受害人案例司法调查没有很大进展，劫持智利教师同业工会某些领导人，某些受害人被切断喉咙的案例，以及1986年9月Carrasco和其他3名反对党成员被杀事件。关于行使司法权问题，他报告说各法庭对行政部门的行为有管辖权，但没有行使这种权利，从而自动放弃了这种管辖权，尤其是未能监督根据《宪法》过渡规定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最后，他谈到流亡者以及“不受欢迎外侨名单”的问题，据称该名单包括有某些智利人，因为他们非自愿地丧失了国籍，他还提到他所

称的侵犯言论自由的情况，以及在1987年6月底和7月初根据军事检察官的命令袭击了七处贫民区。

68. 1987年9月2日和3日，特别报告员还会见了一名智利人权委员会的律师，他将该组织的大量文件交给了特别报告员。这位律师还提到对反对派领导人 Clodomiro Almeyda Mebina 进行三次审判（见下文第4章，案例H-1），他还提到特别是由于1987年6月15日和16日所谓的冲突，在智利发生的令人不安的政治暴行，他还谈到了流放的情况。关于目前由军事法庭审理的约400个案例转到民事法庭的计划，他说这一计划并没有实行，他说如果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根据反恐怖主义法对有关各方进行审判，这意味着惩办更加严厉，而且不得保释。关于临时军事检察官 Fernando Torres，他说他是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三立法委员会的一名官员，被临时指定调查如下3个案件：对劳塔罗面包厂的攻击（在此案中团结共济会的3名官员正受到审判）、对总统车队的攻击和在 Carrizal Pajo 发现武器贮藏所。这位律师称，军事检察官主观臆断滥用法律，危害被告的权益，例如将被告任意从一个拘留地转移到另一个拘留地，拖长单独禁闭的期间。他还指出，辩护律师不断受到恐吓和电话的威胁，因此决定在1987年4月成立“全国政治犯律师协会”。最后，关于在武器贮藏所一案中被关押的嫌犯，他报告说，其中有24名已受到审判，他们在关押和单独监禁初期受到严刑拷问。他们都已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控诉，控告审讯他们的国家情报中心人员。该法庭现任法官 Rene Garcia Villegas 当根据这些指控材料进行适当调查时，却受到威胁，并将国家情报中心官员和军事检察官对他调查的阻挠正式记录在案（见下文第4节，案例B.8）。

69. 特别报告员还于1987年9月4日访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他同南美代表进行了谈话，并同他一起审查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国家情报中心、侦缉局和警察部队之间的协定执行情况，根据这项协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官员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可以会见被关押的人。

70. 在9月4日同一天，特别报告员通过卡尔德伦大使向智利政府正式递交了一份新的备忘录，其中载有在本报告期间发生的所谓侵犯人权的一部分指控。本报告对这些指控予以转载（见下文第4节）。特别报告员转交这些指控，请政府加以评论，他说“我不得不说明我对这些指控极为关切”。

71. 特别报告员于1987年9月4日写信给卡尔德伦大使，信中称鉴于“智利迅速变化的事件以及我将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有关智利人权情况的补充报告”，因此正式要求于1987年11月前两周访问智利。这样，特别报告员于1988年2月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第六份报告时，他希望能报告他第三次访问智利的结果，包括1987年下半年的情况。

72. 最后，特别报告员于1987年9月4日写信给秘书长，通知他说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已通过了关于“智利人权问题”的第1987/60号决议。特别报告员向秘书长表示了他的“意外和惊愕”，他说这可能成为“讨论我各次报告的一个新的和第3个讲坛，这不仅没有必要地增加了我的责任，……而且也给人权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同（智利）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增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

四. 关于侵犯人权的控诉

73. 本节所载资料来自所涉人士、其家属或律师或智利人权组织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法律文件和其它可靠文件。这些资料大部分涉及1987年上半年被控告的违反人权行为。

74. 正如以前一样，特别报告员在1987年9月4日给M. Calderon Vargas大使的信中向智利政府转交了这些指控。信中说，“……并不妨碍阁下政府可能向我转交有关的核查情况，我不得不表示，这些指控使我感到非常关切。”

75. 指控按下述顺序说明：

A. 生命权

B. 身心不容侵犯权

- C. 自由权
- D. 安全权
- E. 获得正当审判和诉讼程序保证的权利
- F. 自由进出国境权
- G. 自由迁徙权
- H.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

A. 生命权

A. 1. Marcos Felipe de la Vega Ribera (1986年1月24日的控诉, 安托法加斯塔刑事法庭), Alejandro Rodriguez (1986年1月24日的控诉, 安托法加斯塔刑事法庭), Ricardo Hugo Garcia Posada (1986年3月20日的控诉, 科皮亚波第二刑事法庭), Claudio Arturo Lavín Loyola (1987年4月30日的控诉, 考克内斯刑事法庭), Pablo Renán Vera Torres (1986年4月30日的控诉, 考克内斯刑事法庭), Manuel Benito Plaza Arellano (1986年4月30日的控诉, 考克内斯刑事法庭), Rafael Pineda Ibacache (1986年7月2日控诉, 埃尔罗瓦-卡拉马刑事法庭)。 这些控诉都是关于在1973年10月对上述人士犯了恶意杀人的控罪。 特别报告员已经报告了在1985年提出的控诉内所叙述的类似例子(参看I/CN.4/1986/2, 第42页, 案件26)。 关于 Marcos de la Vega 的案件, Joaquín Lagos 将军1986年7月3日在一个公证人面前表示, 1973年10月在安托法加斯塔的处决, 已经由圣地亚哥“特务”部队的成员, 在 Sergio Afellano Stark 将军的命令下执行。

A. 2. Manuel Beltrú Salazar (1987年3月30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 Littre Abraham Quiroga Carvajal (1987年4月22日的控诉, 阿奎里塞尔达刑事法庭), Raul Enrique Bacciarini Zorrilla (1987年5月9日向圣安东尼奥第一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 Enrique Andres Repert Contreas (1987年7月2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 所有这些控诉都

是由受害人的亲属提出，涉及1973年9月所犯的恶意杀人控罪。在证明有受军事管辖的人员参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那些案件应该由有关的军事法庭审判。这些军事法庭显然利用了1978年颁布的立法大赦令，撤销了诉讼。

A. 3. Rodrigo Andres Rojas de Negri . 特别报告员自己已经注意到这个人的死亡（参看A/41/719，附件，A. 9号案件）。Carmen Cloria Quintana Arancibia 也同 Rodrigo Rojas 一起受到严重烧伤。特别报告员也注意到一直到1987年1月初为止，受害人的亲属所提出的法律诉讼（参看E/CN. 4/1987/7，第7页，案件A. 2）。1987年1月8日，特别军事检察官 Erwin Blanco 决定给予有关人士关于审判前的诉讼程序，并且宣布证人 Pedro Marcelo Martinez Pradenas 已经交保释放。1月29日，同一个检察官改变了对于军队上尉 Pedro Fernandez Dittus 的指控，并且决定判决他对 Rodrigo Rojas 犯了准杀人罪，对 Carmen Cloria Quintana 犯下准严重伤人罪。同时，他已交保释放。对检察官的决定，已经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上诉，要求检察官起诉两名军官、3名军士长和4名士兵，他们就是参与那一天行动的巡逻队成员。这后一项要求被拒绝，但是向同一个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上诉。5月，军事上诉法庭又驳回了这两件上诉。1987年6月10日和11日，Carmen Gloria 在两次很长的开庭上在检察官面前作证，每个开庭都持续了几乎七小时。1983年6月25日，Carmen Gloria 参加了一次对嫌疑犯的辨认，大约有175名士兵穿着战斗服装，面目完全看不见。Carmen Cloria 说，他认出一名便服士兵，该士兵参加了1986年7月2日的行动；他还说，他认出了另外一名，但是并没有向第一名那样肯定。1987年7月2日，他就嫌疑犯辨认的安排方式向特赦军事检察官提出控诉。他指控说，在他被要求参加的25次嫌疑犯辨认的场合中，有22次，人们告诉他只挑出一个人，也就是巡逻队的带头人，该人只出现一次。1987年7月12日把过去的事件重演一遍；可是却不允许控诉人的律师在场。那次重演是在狱中进行，持续了七个小时，涉及八名证人，巡逻队的队员，以及唯一的生还受害人，他说，他认出了带队的士兵，他形容那是他在嫌疑犯辨认的时候所指出的同一个人。

A.4. Jose Antonio Rivera Martinez. 他的父亲于1986年9月30日向安达科罗刑事法庭提出控诉, 这是关于Jose Antonio 于9月20日被拘留在警察局内, 由于“酒精中毒或肾脏炎”而死亡。根据控诉, 受害人身上有受到野蛮虐待的明显伤痕。根据其他犯人的证词, Jose Rivera 显然受到殴打, 然后被关进牢房里死去; 狱卒对于其他犯人的叫喊不闻不问, 结果受害人在他们面前死去。

A.5. Jorge Alcaino Jimenez. 根据他的妻子1987年1月14日向圣地亚哥第十九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 Jorge 于1986年12月7日被Juanita Aguirre 警察派出所的警员逮捕之后, 于第二天在J.J. Aguirre 医院内死亡。在他死亡那一天, 其家属接获通知, Jorge 已经被送进该医院, 受到严重伤害(头部受伤以及严重的头部撞伤)。

A.6. Recaredo Ignacio Valenzuela Pohorecky (1987年7月1日向圣地亚哥第十二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根据官方说法, 他是在1987年6月15日在拉斯孔德斯公社同国家情报中心的人员的一次冲突中死亡。另一方面, 控诉指出, 他是在背部以及颈背, 而非身体的正面, 受到枪击。Juan Waldemar Henriguez Araya (1987年7月22日向Aguirre Cerda 郡第七刑事法庭提出控诉)。于1987年6月16日在他家中死亡, 据控是同国家情报中心的人员发生冲突。根据控诉, 医疗证明书表示, 死亡是由于胸部的枪伤所造成, 枪伤影响了肺部以及肺动脉的右支管和左支管, 造成严重的失血。Julio Arturo Guerra Olivares (1987年7月2日向圣地亚哥第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1987年6月16在他家中被国家情报中心人员杀死。Esther Angelica Cabrera Hinojosa, Elizabeth Edelmira Escobar Mondaca, Ricardo Hernan Rivera Silva, Ricardo Crisian Silva Soto, Manuel Eduardo Valencia Calderon (1987年6月26日向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根据指控

这些人是在1987年6月16日在Conchali公社同安全部队冲突中被杀。根据这些控诉，“有足够的理由声称，这些人的死亡很可能可以由可能存在的杀人罪来解释，而非发生了所谓冲突”。所有这些杀人事件都牵连到所谓“阿尔巴尼亚行动”，最后在1987年6月15日和16日所谓的冲突事件中，造成12人的死亡。

B. 身心不可侵犯权

B.1. Soledad Miriam Quiroz Rojas. 他于1986年6月26日向阿里卡第一刑事法庭提出控诉。1986年6月16日，Soledad被一个名叫“Armageddon”的准军事集团成员用子弹射伤，该集团当时正在攻击埃尔卡门教堂（参看下面案件D.2）。

B.2. Jorge Alejandro Martin Martinez. 根据他在圣地亚哥监狱内于1986年12月9日向圣地亚哥的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提出的控诉，控诉人于1986年6月30日被4名穿便服的人员逮捕，那些人自称是警察。他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带到警察局，在审问时受到刑求。后来，他被交给国家情报中心的官员，并且被带到国家情报中心的房舍内，审问到最后是对他的身体许多部位用电刑。后来他被转送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根据记录，他在那里受到Victor Fernandez Villalobos 医生的检查，该医生证实了一些伤处。

B.3. Gloria Margarita Carvajal Huerta. 1986年10月2日，她向圣地亚哥第十八刑事法庭提出控诉，控告国家情报中心的官员于1986年9月3日在他家中逮捕她。她被带到国家情报中心在Borgono街的办事处，在那里，她受到刑求，包括对她身体最敏感的部位实施电刑——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一直都是裸体。

B.4. Manuel Joel Miranda Chavez. 他是从前圣地亚哥公共监狱的一名犯人，1986年10月22日，他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控诉，控

告在圣玛丽亚街 1453 号的国家情报中心办事处官员，他们在 1986 年 9 月 9 日逮捕了他，将他带到上述的办事处，根据指控，他们对他用刑，把他浸到水里，一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并且在审讯时对他使用电刑。

B.5. Alfredo Carlos Castillo Yunge 和 Luis Figueroa Rojas . 他们是两个学生，于 1986 年 9 月 8 日在一辆属于荷兰大使馆的汽车内旅行时被捕。他们各自于 1986 年 9 月 30 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声明，声称他们在审讯时受到殴打和电刑（在他们被拘留的头 20 天内）。关于他们被拘留的一些不合常规情况，参看下面 D. 3 号案件。

B.6. Guido Alvarado Aguero , 安库德智利人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和 Jose Nahuel Carimaney , 安库德建筑工会主席。1986 年 11 月在安库德公证人面前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他们指出，1986 年 9 月 24 日，他们分别在家中被国家情报中心的便衣人员逮捕，被带上车，开到瓦尔德维亚的国家情报中心办事处。根据他们的供述，在审讯时，他们受到殴打，他们身体的许多部位受到电刑。

B.7. Nelson Enrique Gonzalez Ugalde 于 1987 年 1 月 31 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一项预防性执行宪法权利的申请。在申请书中，他指控他在 1986 年 10 月至 1987 年 1 月中遭受 6 次非法拘禁时，有几次在审讯中受到殴打。

B.8. Jose Abelardo Moya Toro 和其他 20 人（1986 年 9 月 5 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和 Claudia Enroque Molina Donoso 两名其他人（1986 年 10 月 7 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特别报告员已经报告了这些案件（参看 E/CN.4/1987/7, 第 11 和 12 页，案件 B.17 和 B.20）。关于上述的控诉应该指出，国家情报中心在 1986 年 10 月 1 日给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的官方来文中，要求法庭处理第 15, 218-2 号案件—该控诉是在该案件内提出—该案件是指控审讯警官，当时正由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处理，理由是牵涉到那些事件中的人员是在履行一项军事职务。军

事法官表示同意并且要求军事法庭宣布它没有管辖权。民事法官于1987年6月16日拒绝了该项要求，指出“国家情报中心公开地阻碍那些法律规范的执行，首先是不答复法官的命令，然后是公开拒绝提供资料以及提供被控诉人，这可以从记录中看到。国家情报中心拒绝提出被控将控诉人带到 Avenida Santa Maria 军营中的那些人的姓名，以及指出那些指出审讯的人……如果它适当地遵照有关各项决议，而非只是假装遵照——这是一项可受惩罚的罪行——它就已经消除了对于调查的真正进展的一个基础障碍”。1987年8月18日，最高法院解决了关于职权的争论，是对第二军事法庭有理，同检察官的建议正好相反。

B. 9. Vasily Carrillo Nova 同第1919-86号案件一起审判。特别报告员已经提到他被隔离拘禁的时间太长（E/CN.4/1987/7，第22页，第D.32号案件）。在他被关在从前的公共监狱期间，他于1987年3月6日向圣地亚哥第三刑事法庭提出了一项控诉，控告调查的警官，他们于1986年11月11日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带到警察局。他指控从他被捕开始就一再受到殴打，后来在国家情报中心的办公室，在审问期间他的身体最敏感的部位又受到电刑。在审问结束后，有10天不能走路，有两个多礼拜不能吃固体食物。

B. 10. Jose Eduardo Santis Diaz 他于1987年1月12日向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提出控诉，指控他在1986年11月在街上被绑架，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点，他在那里受到刑求拷问，包括在他身体的敏感部位实施电刑。

B. 11. Julio Aranguiz Romero 他于1986年12月31日向康塞普西翁上书法庭提出控诉，他指控他在1986年11月14日被绑架并且在一个秘密场所受到刑求拷问，包括对他的身体敏感部位实施电刑。

B. 12. Juan Carlos Munoz Pando 根据1987年1月29日向康塞普西翁上法庭提出的一项控诉，他于1986年11月14日被便服军人逮捕。他们把他带到康塞普西翁的 C'Hggin 军营内。他在那里受到刑求拷问，他身体的敏感部位受到电刑。

B. 13. Roxana Mraia Farina Concha 在1987年3月24日在康塞普西翁所作的一次宣誓声明中，她报道她在1986年12月8日她被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见下面第D. 12号案件）到12月12日，她是在塔尔卡的一所军营内，她的丈夫被关在那里。在她留在那里的时候，她受到身心的胁迫。

B. 14. Claudio Vergara Diaz and Erasmo Mayorinca Chavez 这两个人都是圣地亚哥监狱的犯人。他们在1987年2月6日向第三刑事法庭提出一项控诉，控告逮捕他们的调查警官，前者于1987年1月9日在他家中被捕，后者于第二天于他工作地点被捕。这两个人被带到警察局，受到刑求，看来目的是要强迫他们签署庭外供述状。

B. 15. Pedrp Raul Marin Hernandez 他是一名医生，他于1987年3月12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一项控诉，他当时被关在一个以前的圣地亚哥公共监狱内，他控告1987年1月15日将他逮捕的调查警官，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局，他指控他在警察局内受审问时受到刑求，鸡奸并且他身体的最敏感部位受到电刑。

B. 16. Miriam Berhelz Maquire。她是一个护士，她在1987年2月7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控诉，当时她被关在圣米格尔监狱内，她指控调查警官于1月15日在街上将她逮捕，并把她带到警察局，她在警察局被审讯时受到刑求，包括电刑。

B. 17. Marco Antonio Marin Gallardo . 1987年月2月7日，他向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提出控诉，他指控他在1987年1月16日在街上受到便服警察的不必要暴力行动。

B. 18. Manuel Hernandez Vidal。根据他于1987年2月6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对国家情报中心官员的控诉，他于1987年1月21日被捕，被带到国家情报中心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在身心受到胁迫，包括电刑的情况下受审讯。

B.19. Jorge Pino Molina and Manuel Jesus Ubilla Espi-rcza (在第1919-86号案件中被特赦军事检察官审判)。根据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检察官1987年1月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庭提出的控诉,这两个人在受到国家情报中心人员拘留并且在国家情报中心办公室受审讯时受伤。

B. 20 Ronald Douglas Wilson Arenas 他在1987年2月8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书中申诉说,在1987年1月28日、29日和2月4日这三天里,他在家里接到许多电话。其中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他将遭到他的朋友 José Manuel 所遭到的同样命运。据请求保护书说,打电话的人是指 José Manuel Parada Maluenda (1985年3月30日发现他的喉咙被割。见A/40/647,第30和31页, A.6号案件)。

B. 21 Marco Antonio Montero López 和 Sandre Virginia Marin Viguera 他于1987年3月13日向塞普西翁第一军事检察院申诉说,1987年2月12日,15名身着便服和军装的人员在他们家里搜查,将他们逮捕,然后带到某地。在审问时, Marco Antonio 曾被殴打, Sandra 受到强奸威胁,并且还将一根带电的电线放在她嘴里。

B. 22 Victor Hernán Guerra Braso 1987年2月20日他在圣地亚哥的一名公证人面前宣誓后供述说,他在1987年2月18日被一名带有武器的便衣人员逮捕,将他带到一个警察分局。他在审问时曾被殴打,并遭受电刑。

B. 23 Mauricio Fabio Arenas Bejas 1987年2月19日在此之前,他在一次冲突中受重伤。被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后,他母亲以他的名义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特别报告员所获资料, Mauricio 住进索特罗德德里奥医院,因为他头盖骨中有一颗子弹,其他子弹在他的胸腔和下肢里。他在住院期间,整天都有武装警卫人员看守,完全同外界隔绝。他的双手被铐在床头的横木上,完全置于军事监视之下。在39天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虽然他的病情极端严重,但军事检察官仍然对他进行了十次审问。

B. 24 Emilio Rodriguez Jara (1987年4月28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院提出控诉)、Leopoldo Gutiérrez Panzoca (1987年4月28日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院提出控诉)。这两个人因涉及第1919-86号案件而被关在上述公共监狱。据他们提出的申诉书所述，他们于1985年2月19日在家里被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然后带至某处。Emilio 在被审问时，曾受到威胁和虐待，包括受电刑。如果他同他们合作，并向他们提供一些名单的话，他们答应给他钱，替他买栋房子，办签证，还将让他自由出国。Leopoldo本人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威胁，包括电刑。

B. 25 Pedro Andres Pérez和Patricio Madriel Ahumala López 第1499-86号案件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于1986年9月15日提交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其中申诉说，他们在前一天被便衣警察逮捕，然后带到圣路易斯警察分局。在审问时，他们曾受到电刑的酷刑。

B. 26 Christian Joaquin Caceres Celis 据他在1987年2月23日向佩德罗·阿基雷·塞尔达上诉法院提出的及早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侦缉局人员于1987年2月19日在警局内对他作出生命威胁。他是在街上被捕，然后送到警局。在审问时，他身体上大部分的敏感部位都受到电刑。

B. 27 Victor Domingo Rebolledo Parra 他在1987年2月25日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中申诉说，侦缉局人员于1987年2月23日在家里将他逮捕，然后送到洛塔的警察局。在审问时，他曾受到电刑的酷刑。

B. 28 Benigno Antonio Catalán Arce 他的兄弟于1987年2月2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根据记录，三名便衣人员于1987年2月24日在街上将Benigno逮捕，然后带到某处。在审问时，他一再受到威胁，指他涉嫌加入左派革命运动，也即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

B. 29 Claudia Elena Drago Camus 她父亲于1987年3月2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第169-87号案件)。据请求书所述，数名便

衣人员在比尼亚德马尔将她逮捕，同一天将她送到圣玛丽亚街（圣地亚哥）的国家情报中心营地。她一直被蒙住眼睛，在审问时，她曾被殴打和受到威胁。

B. 30 Ana Maria Aravena Gross 和 Juan Eduardo Loggenweiler 1987年3月2日曾以他们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理由是他们于1987年2月27被数名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非法逮捕。根据记录，Ana Maria 曾受到精神威胁，例如迫使她听她丈夫在受审问而遭受电刑时发出的喊叫声。

B. 31 Gerardo Antonio Alvarez Carrasco 1987年3月9日曾以 Gerardo 的名义向瓦尔帕莱索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Gerardo 是费德里科·圣玛丽亚耶技术大学的学生。请求书中申诉说，数名便衣和军事人员以及警察于3月9日在街上攻击他，随后将他带到瓦尔帕莱索急救站，经诊断头盖骨受伤。

B. 32 Genoveva Novoa Navarro 她于1987年3月26日在康塞普西翁经发誓后所作的供词中说，大约30名侦缉局人员于1987年3月14日在她家里搜查。她的四个兄弟，她的儿子 Marcelo 和她本人均被捕，然后带到警察局。在审问时，她一直赤身裸体，遭受殴打，并威胁要强奸她和伤害她的幼子。

B. 33 Luis Ennique Silva Rojas 据1987年4月6日他向圣地亚哥第二十刑事法院提出的申诉说，他于1987年3月16日被一名警察逮捕，然后送到圣拉斐尔警察分局。在审问时，他遭受国家情报中心人员殴打。事后他被送到索特罗德尔里奥医院检查；检查完毕之后，又被送回原警察分局。最后被用车子送到圣玛丽亚街1453号管区，并施加电刑。在三天内，这样来来回回共达10次之多。

B. 34 Guillermo Guillermo 和 Ignacio Santander Robles 他们于1987年6月11日向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郡第三刑事法院提出申诉，控告第十二警察营区的国家情报中心人员。据申诉书说，数名武装便衣人员于1987年3月18日在他们家里非法搜查。便衣人员将他们和另外四人逮捕，带到警察局。在审问时，他们遭受酷刑，包括电刑。

B. 35 Guillermo Segundo Santander Robles 和另外两人。据他们于1987年3月19日向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他们于1987年3月18日在自己的家里被国家情报中心的武装便衣人员逮捕，然后送到国家情报中心所属的警察单位。Guillermo 全身各个部位都遭受电刑。

B. 36 Maria Olga Allemand Ramirez 她是《分析》杂志的新闻摄影记者，她于1987年4月23日向圣地亚哥第十刑事法院提出申诉。据申诉书所述，她于1987年4月3日在奥伊金斯公园执勤时，被警察发射的子弹打伤。

B. 37 Ricardo Hernán Campos Urzúa 据他于1987年6月24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一份文件所述，国家情报中心人员于6月24日任意将他逮捕，罪名是违反《军火管制法》。他被关在牢里，禁止同别的被拘留者来往。在他被关在警察管区期间，曾被严刑拷打，加以盘问。1987年8月3日，一名法医曾在南圣地亚哥的一座防范性拘留中心对他作身体检查。

B. 38 José Francisco Silva Hidalgo 当他的律师（第805-87号案件）于1987年8月21日通知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上诉法院时，Silva 在拘留期间已经受伤。法医 Victor Velázquez 在北圣地亚哥防范性拘留中心对他作了身体检查，并于1987年8月18日证明 Silva 被“尖头工具”弄伤多处，需要12天至14天始能痊愈。关于 José F. Silva 受到行政拘留时发生的违法情事，见下文D. 71号案件。

C. 自由权

C. 1. BEATRIZ BRINKMANN SCHEIHING和其他12人。1986年9月22日以他们的名义向瓦尔的维亚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他们都是于1986年9月19日在家里被数批便衣人员逮捕。这些人说他们属于国家情报中心，其中有些还有士兵随行。他们于1986年9月24日被移交给军事检察院，随后又被送到瓦尔迪维亚防范性拘留中心，并且以违反《军火和炸药管制法》（第17.798号）罪名，将他们隔离。BEATRIZ BRINKMANN SCHEIHING的律师

向军事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书，控告瓦尔迪维亚军事检察官，将她交付审判，不准保释。据申诉书所述，BEATRICE曾受到酷刑，其他12名被拘留者也曾受到酷刑。

C.2. RUBY DE LA LUZ CORVAJAI SAAVEDRA. 1986年10月29日以她的名义向瓦尔帕赖索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在此之前的同一天，她被基略塔的警察逮捕。据特别报告员所获资料，据说RUBY被关在利纳切第三警察分局。上诉法院于1986年11月6日宣称它无权受理，并将案卷移交军事上诉法院审理。后来RUBY被关在基略塔防范性拘留中心，罪名是违反第18.314号法律第8条（没有把和她同居的人涉嫌所干的恐怖活动向当局报告）和第17798号法律第8条（涉嫌成立军事性质的政党）。

C.3. MARIC OSVALDO MEDINA ROSSI 和其他七人。他们是洛德斯德尔塞罗洛斯普拉塞雷斯教区教会社会行动小组的成员和参与者以及人权委员会的成员。1986年11月6日以他们的名义向瓦尔帕赖索海军军事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他们都是在1986年11月4日凌晨在家里被捕。此外，还以LEONARDO EUGENIO RUBIO CARCAMO, BERRARDINO JESUS CHACAMA VERGARD和PATRICIO RAFAEL CORRANZA SANTANDER的名义提出请求保护权利书。他们虽然不属于上述人权委员会，但都是在同一时间和相同的情况下被捕。据特别报告员所获资料，请求书中的申诉人是被北帕龙第三警察分局的警察逮捕。这些警察身着仿野战军装，脸上还涂上颜色。大批便衣人员大概是国家情报中心官员，也参与这次逮捕行动。

C.4. PATRICIA MIRANDA 和其他24人。据1986年11月11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他们于11月11日在康塞普西翁大教堂的石阶上被警察逮捕。他们遭到警察毒打，然后被带到第一警察分局。

C.5. JUAN CARLOS MUNOZ PANDON. 据1986年11月15日向康塞

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他被数名国家情报中心便衣人员逮捕。他们出示逮捕状，并且说将把他移送到国家情报中心的一个兵营。

C.6. WILMA CECILIA ROJA TOLEDO. 1986年11月17日曾以她的名义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请求书所述，WILMA 是于11月15日在她祖母家里被数名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被捕前，她祖母家里曾被搜查。

C.7. RENE SEGUNDO MILLAR VALLEBENITC. 据1986年11月17日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他于11月15日在LIDIA SAEZ ROA的家里被一批武装便衣人员逮捕。他们没有出示逮捕状。拘捕行动粗暴，造成很大混乱。

C.8. RENE ALEJANDRO PORTINO. 据1986年11月17日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的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所述，他于11月15日被数名国家情报中心人逮捕。他们没有出示逮捕状。

C.9. JULIO ARANGUEZ. 1986年11月15日以他的名义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同一天他被数名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他们没有出示逮捕状。

C.10. ROXANA FARINA CONCHA. 1986年11月9日以她的名义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她于前一天在她父母家里被数名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逮捕(见下面D.12号案件)。她的丈夫于1986年12月3日在库里科被逮捕。

D. 安全权

D.1. PCDRO VERA CASTILLO 和其他四人。他们是康塞普西翁大学的教师。他们于1987年1月15日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普通诉讼，控告康塞普西

翁大学代理校长。他们的目的是要使第 83-346 号法令完全无效，从而恢复该《大学章程》的效力，使所有任职一年以上的教授作为大学的合伙人而得以恢复他们的职位。一些学术性协会会长曾于 1986 年 3 月 10 日提出请求保护权利书，所持理由是，第 83-346 号法令是个秘密法令，公布时并没有通知合伙人，直到 1986 年 3 月 10 日始行通知。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于 1986 年 11 月 19 日准予上诉，但被最高法院于 1986 年 11 月 19 日驳回，其论点是应于该法令在 1983 年 7 月 7 日颁布起 15 天后提出上诉。

D. 2. SANTIAGO MARSHALL SILVA 他是阿里加埃尔卡门教会的教士。他于 1986 年 6 月 23 日代表在教会内工作的基督团体和他自己向阿里加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书，即第 15470 号案件。在此之前，即 1986 年 6 月 16 日，数名蒙面人驾着一辆货车，用武器和燃烧弹攻击教会（见上面 B. 1 号案件）。上诉法院在其 1986 年 7 月 4 日的裁决中决定受理该请求书，并命令派一名警察看守教会 60 天以保护教会。上诉法院还将可能存在着一个叫做“善恶决战”的准军事团体的申诉书通知第一区区长。

D. 3. VICTOR LEONARDO TAPIA BELLO 和其他三人（第 1423-86 号案件）他们是圣地亚哥大学的学生。1986 年 9 月 8 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他们在这天进入荷兰大使馆递交一封信，宣传智利各大学里的情况。据请求书所述，他们是在离开大使馆总部被保安人员使用暴力手段逮捕的。根据记录，国家情报中心拒绝让法医协会的医生为他们作身体检查，也不让他们会见亲属和律师。9 月 25 日，四名学生中有三名已予释放。随后，JOSE FAUNDEZ 被军事检察院判决有罪，罪名是违反《军火和炸药管制法》（见上面关于可能对其中两人施以酷刑的 B. 5 号案件）。

D. 4. JULIO LUIS GUTIERREZ GARAY 1987 年 1 月 28 日他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公证人面前所作的经过发誓的供词中说，他于 1986 年 9 月 9 日和 10 月 4 日分别被数名便衣人员绑架。他们查询他的政治活动以及他于 1986 年 9 月

7日前往卡洪德迈普的原因。在他被绑架期间，他于9月9日被殴打。释放后，数名便衣人员到他家去查问他，1987年1月8日又到他家去了几次。

D.5. MIRIAM MONTECINOS 和她的儿子 HERNAN ANDRES MEGE. 1986年11月5日以他们的名义向特穆科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请求书所述，两名便衣人员于1986年10月14日拜访MIRIAM，告诉她他们属于一个协助智利回国的流放者子女的教会组织。10月27日她收到一个通知，其中对HERNAN施加威胁，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的儿子。

D.6. FANOR CASTILLO GONZALEZ. 他是一名律师兼瓦尔帕赖索智利人权委员会的秘书长。1986年10月30日以他的名义向瓦尔帕赖索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书（第512-86号案件）。在此之前，他于1986年10月27日在电话上接到死亡威胁。其中有一个打电话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他属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并且提到对CORLOS GODOY的审判。上述请求保护书证明FANOR CASTILLO是个认真负责的律师，还证明他和瓦尔帕赖索智利人权委员会都没有卷入该组织的活动。

D.7. ANTONIA SANHUEZA BARRERA. 1986年10月23日以她自己和她家人的名义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在此之前，她家曾被数名便衣人员和警察搜查。搜查行动粗暴，造成很大混乱。

D.8. RICARDO BENJAMIN BRAVO FAUST. 他于1986年10月31日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及早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书。据请求书所述，自1986年5月以来，他一直受到便衣人员的迫害和恐吓。10月中旬，他在家里被数名侦缉局人员逮捕，带往警局，查询他的政治活动，并迫他停止探望他在牢里的兄弟。10月29日，一批便衣人员到他家里要人。

D. 9. Maria Elena Callao Aceitun, 瓦尔帕莱索智利人权委员会政治犯亲属协会会长。 1986年10月27日,有人在电话上威胁她的生命。 10月28日,不认识的人在街上同她搭话; 10月29日,一个可疑的人藏在她家附近。 1986年10月30日,以她的名义向瓦尔帕莱索上诉法院请求保护(第513-86号案件)。

D. 10. Jaime Patricio Tapia Fica 1986年11月4日,以他的名义向瓦尔帕莱索上诉法院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申请书中说,他于10月28日在Linache遭到逮捕并为一发子弹击中。 11月3日,以Gregorio Enrique Tapia Tapia及其家属的名义向瓦尔帕莱索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因为Jaime Patricio于10月28日被捕,他们担心自己也会遭到逮捕。 1987年1月20日,以Jaime Patricio的名义向同一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Jaime Patricio当时扣留在瓦尔帕莱索的重新适应社会生活辅导中心。 申请书中说,前一天Jaime Patricio在van Buren医院时,有人试图予以劫持。

D. 11. Julio Santana Avila Ivan Salazar Catalan和Neftali Navarrete Bustos,任职康塞普西翁卫理公会教会。 1986年11月3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申请书中说,1986年10月29日,四名便衣人员逮捕了Luis Patricio Cid Salgado,讯问上述请求保护者的活动,审问完毕后并用香烟烫伤他的双手。 1986年11月3日,Luis Patricio以他本人的名义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D. 12. Maria Concha Sanhueza, 1986年12月9日,她以本人和家属的名义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从1986年11月以来,她的住所一直受到监视,家人并为人所跟踪。 她的女儿Roxana Farina Concha终于于1986年12月8日遭到逮捕并受到胁迫(见上面第13号

案件)和非法拘留(见上面第C. 10号案件)。

D. 13. Carmen Rosa Rodriguez Troncoso, 1987年3月21日, 她在向康塞普西翁的一名公证人宣誓后陈述说, 1986年11月12日, 她遭到想要在街上逮捕她的警察部队人员的殴打。她因为已有身孕而前往地区医院, 检查出身上有好几处青肿。随后她又前往康塞普西翁的第一警察分局抗议受到虐待, 但是警察部队人员不但没有将她的指控作下笔录, 反而将她逮捕, 第二天并将她送往军事检察官办公室, 控以粗暴对待警察部队人员的罪名。

D. 14. Luis Alberto Pardo Seguel, 前Bio-Bio大学电机工程学生。1986年12月24日, 他向康塞普西翁上诉法院提出请求保护书。申请书中说, 1986年12月5日, 他由于以前的一次犯规行为而被Bio-Bio大学校长暂令停学一学期并不得涉足大学房地。

D. 15. Sandra Del Carmen Pinto Silva, 1987年1月6日, 她向P. Aguirre Cerda 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她指控说, 1986年12月11日, 她在家中接到恐吓性的电话, 12月31日又为两个人从车中监视。

D. 16. Vasily Carrillo Nova, 因第1919-86号案件待审。1987年3月26日以他的名义向军事上诉法院请求保护宪法权利。申请书中说, 他从1986年12月15日以来就一直不得与监禁在16-A街的前公立监狱的同一案件被告接触。

D. 17. Raul Arturo Ramirez Faundez 于1987年1月6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申请书中说, 1986年12月15日, 他同当时以冶金工人联合会大会代表身分在圣地亚哥的一名丹麦工会领导人在街上遭到逮捕, 从那时以来, 他就一直受到国家情报中心人员的监视和跟踪。当时他为警察部队人员逮捕, 后来送到第一警察分局, 在那里国家情报中心人员讯问Raul Arturo 该丹麦工会领导人的活动。

D. 18. Maritza Elena Valenzuela Barragan 1987年1月2日她以本人和儿子 Ignacio Octavio Cisterdas Valenzuela 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申请书中说, 1986年12月22日, 国家情报中心人员非法搜查她的住所并讯问 Ignacio 以前一名房客的情况。在这同时, Maritza 在工作地点为两名便衣人员所逮捕, 并受到有关该房客的讯问。

D. 19. Procesa del Tradsito Acevedo Bravo 她以本人和女儿 Elena Gagos Acevedo 的名义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指称1986年12月24日, Elena 的住所受到五名武装便衣人员的搜查。申请书中说, 这些人员讯问她另一个住在国外的女儿 Rosa Lagos 的情况。申请书中并说, Procesa Acevedo 和 Elena 的住所都受到监视, 母女两人在街上并为不认识的人所跟踪。Rocesa Acevedo 并以她本人和家属的名义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指称从1987年4月以来他们的住所不时受到搜查, 他们本人并受到武装便衣人员的恐吓。这些人表示自己是警察部队人员或侦缉人员, 并讯问他们她的儿子 Leonardo Gagos Acevedo 的所在, 并声称后者涉及私藏武器案件。

D. 20. Sergio Ferdando Ruiz Lazo (第143, 671—1号案件。1987年1月19日, 他妻子的律师向第三刑事法庭提出书面陈述说, 1986年12月, 他的妻子从圣地亚哥中央邮局的邮箱收到一个信封, 内有他丈夫 Sergio Ruiz 的身份证明文件、护照和其他物品, Sergio Ruiz 从1984年12月以来一直下落不明, 据说是受到拘留,(见 E/CN. 4/1986/2, 英文本第71至72页, 第D. 3号案件)。

D. 21. Maria Soledad Pérez Larrea 1987年1月15日, 她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请求保护, 指称她于1987年1月8日接到一些自称属于所谓“公民民族阵线”的人的电话。

D. 22. Gloria Ester Cubillos Vilches 1987年1月12日, 她在向一名

圣地亚哥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控说，1987年1月8日，几个不认识的人将她逼进一辆汽车，讯问她参加圣地亚哥大主教管区东区牧师辖区暑期学校的一些人士的情况。他们并指控她属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控告人早在1985年就已受到恐吓。

D. 23. Cayetano del Rosaro Castillo Riso 于1987年2月13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他指称于1987年1月9日为几名便衣人员所劫持，这些人员讯问他贫民区领导人的情况，并对他加以殴打和恐吓。

D. 24. Juana del Carmen Sáez Sáez 1987年1月19日，她以本人和 Carmen Luz Palma Palma 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她指控说，1987年1月15日，她们的家遭到搜查，搞得凌乱不堪，并遗失了一些贵重物品。申请书中说，控告人的邻居看到一些便衣人员从一辆侦缉人员常用的那种颜色的货车中出来，从后窗强行闯入住所。

D. 25. Monsignor Olivier D'Argouces，圣地亚哥西区主教派教会牧师。他于1987年1月15日以 Senora de la Preciosa Sangre 教区教会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请求保护，指称从1986年中以来，教会一再受到身分不明的人的袭击。1987年3月6日，他的请求得到核准，教会得到了司法上的保护。

D. 26. Osvado Arnaldo Toro Vasquez Quilicura 地方人权委员会主席和 Marta Hidalgo Dávila，该委员会成员。他们在1987年1月16日在公证人面前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7年1月15日，他们接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来的恐吓性电话，那人自称是为智利人权委员会打电话给他们的。

D. 27. Ernesto Sierra Rojas 于1987年1月30日在圣地亚哥宣誓后指称，1987年1月16日，有人在未得到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他的住所和他的儿子 Luis Ernesto 的住所。他们在搜查期间得知，调查行动与前一天的银行抢劫案有关。

D.28. Nelson Goucoto Pereira. 1987年1月16日, 他书面要求圣地亚哥第三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掘出圣地亚哥公墓第29区第2342、2365、2460、2481、2665和2526号墓中的尸体, 因为他认为这将有助于推断24名来自Paine的人失踪的情由(第952-80号案件)。这24人是1973年10月失踪的, 他们的失踪与可能属于圣贝尔纳多步兵学校的穿军服的陆军人员有关。

D.29. Jovedal José Grez Ordoñez. 于1987年1月19日向 Pedro Aguirre Cedra 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他指称那一天有六名武装便衣人员非法搜查他的住所, 并通知他母亲叫他到警察总局报到。申请书中说, 同一天这群人又去搜查他一个朋友的住所, 以期在那里找到并逮捕他。

D.30. Eliana Rojas Sánchez 和 Francisco Coloane Cárdenas. 1987年1月30日, 他们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请求保护, 指称他们从1986年10月以来不时接到威胁他们生命的电话和信件。最近的一次威胁是“罗兰多·马图斯”小组以其署名的用户电话的方式进行的。

D.31. Eugenia Iizama López. 她在1987年2月4日向圣地亚哥的一名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 1987年2月22日, 她收到一通恐吓性的用户电报, 其内容与同一天她的一个作家朋友 Francisco Coloane Cárdenas 收到的电报内容相同。

D.32. Juan Carlos Bordones 和另五名学生. 1987年1月23日以他们的名义向 Valaparaiso 的费德里科·圣玛丽亚技术大学法庭请求复审。申请书中说, 有关这些学生的审判前程序有某些不符司法程序之处。这些调查阶段和确定罪状的过程中不符司法程序之处表明, 这些学生没有机会作适当的辩护, 结果对他们作出了不公平的决定。

D.33. Julia Emperatriz Astorga Cornejo. 她在1987年2

月2日向圣地亚哥一名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7年1月29日，她父亲的住所遭到几名便衣人员的搜查，当时她也在场。这些人员告诉他们说，已经监视他们一个星期之久。控告人表示，他们全家都是属于当地耶稣升天教区教会的基督徒。

D.34. Ricardo Eduardo Valenzuela Riquelme. 他在1987年2月3日向一名圣地亚哥的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7年1月30日，几名身分不明的便衣人员将他逼进一辆汽车，讯问他在圣马丁·德波雷斯教区教会内的活动，询问期间强灌他水并连击他的腹部。

D.35. José Antonio Lucio Sabat Méndez. 他在1987年2月23日向一名圣地亚哥的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7年1月和2月，一些自称为民族战斗阵线成员的人打电话威胁他的生命。控告人说，他是圣地亚哥中学生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兼基督教中学生协会主席。他于1986年11月5日参加一项文化活动后被捕，将因违反军火管制法受圣地亚哥第一军事检察官审讯。

D.36. Armando Ramiro Olivares Bellos 和另三个人。于1987年2月6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申请书中说，2月3日，科罗内尔的警察部队人员强迫申请人停止他们在第二个全国志愿工作日进行的活动。警察部队人员告诉他们说，志愿工作是违禁的，并要他们交出工作说明和计划和所有参加工作者的名单。

D.37. Julio Humberto Araya Cepeda. 1987年2月12日，以他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请求保护宪法权利。申请书中说，1987年2月9日，他在家中被几名便衣人员逮捕，用货车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他们在劫持期间讯问他某些武器的所在，并因为他是冶金工人而指控他制造武器。根据记录，他在一次审问期间遭到殴打。

D.38. Karim Miquel Elfar Ricardi, Tabacura 国家职业训练学院(职训学院)学生中心秘书。他在1987年2月20日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6年4月和10月和1987年2月12日,几名便衣人员拦住他讯问他在职训学院的活动。最后那一次他们还提到他的妻子可能会发生意外。

D.39. Gloria del Carmen Rodríguez Meneno .她在1987年2月24日在康塞普西翁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说,1987年2月12日,她在 Dichato 被便衣警察部队人员逮捕,送到该城的警察分局。在审问期间,她被剥去衣服并受到殴打。

D.40. Claudio Pablo Bernardo Escolar Cáceres, 塞瓦斯蒂安·阿塞维多反对酷刑运动成员,参加了安德烈斯·贝略非暴力大学校际积极运动。他在1987年2月13日向圣地亚哥一名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他在同一天接到威胁他生命的电话。

D.41. Nancy Liliana Saavedra Bustamante, 解聘教师,智利教师同业公会成员。她在1987年2月20日向圣地亚哥一名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7年2月13日和19日,她和她的姐妹 Mónica 接到恐吓性的电话,1987年2月14日,她本人又为便衣人员所跟踪。

D.42. Luis Alberto Rojas Pino ,他在1987年2月20日向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指称,1987年1月9日和22日,他为几名便衣人员所跟踪,1987年2月14日,他在被便衣人员指出后遭到警察部队人员的逮捕。第二天他目睹几个朋友在受到便衣人员监视后被警察部队人员逮捕。

D.43. Jorge Aleiandro Zúñigo Paulov, 学生领袖,智利大学学生协会会员。1987年3月16日,他向圣地亚哥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指称从1987年2月中以来,便衣人员三度登门,未出示任何身分证明而问了许多关于他的问题。

D.44. Adolfo Aedo Casanueva , 1987年3月10日向 Tomé 刑事法庭提出的控告书中说, 1987年2月18日, 上述法院对 Adolfo 发出逮捕状予以逮捕。 后来他被关进 Tomé 的前公立监狱。 在受监禁以前, 他曾遭到一名侦缉人员的殴打。

D.45. Claudina del Carmen Núñez Jiménez, 城市贫民区居民协会总秘书。 1987年2月25日, 他向 Pedro Aguirre Cerda 上诉法院提前请求保护宪法权利, 指称1987年2月23日, 便衣人员到她家讯问她的兄弟她的情况并威胁说还会再来。 有关她的记录上说, 1987年2月27日和3月9日, 她的住所受到便衣人员监视。

D.46. Guillermo Osvaldo Saldias Urrutia, 1987年3月4日向康塞普西翁第一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控告书中说, 1987年2月25日, Guillermo 在街上被警察部队人员逮捕时受到一只警犬的袭击。 他被警犬咬伤, 但是带着那只警犬的警察部队人员并没有喝止警犬。 后来他被送到第一警察分局, 接着移送区域医院治咬伤, 然后又送回第一分局, 监禁到第二天。 整个拘留期间他都没有进食。

D.47. Victoria Sabater del Fierro, Hernán Sarmiento Sabater 的母亲, 1974年7月28日在 Parral 遭到警察部队人员逮捕, 从此就一直下落不明。 他的母亲是政治犯亲属协会的会员, 曾在1987年3月23日向圣地亚哥一名公证人宣誓后所作的供述中证实她的儿子失踪。 当时她指称, 她告诉了她的房客 Hernán 失踪的事, 1987年2月25日, 这名房客安排同她见面谈她儿子的事。 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告诉她 Hernán 还活着, 表示如果给他一笔钱, 就可以提供更多的消息。 但是这个人教她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否则将会危及她另四个儿子。 她本人和房客的生命。

D. 48. Mercedes del Carmen Castro Arraño. 在1987年3月2日向Pedro Aguirre Cerda上诉法院提出的一份防犯性保护申请中, 他声称前一天收到电话打来的死亡威胁。 Mercedes曾经是1985年3月30日遭到割喉杀害的小学教师Manuel Guerrero的同事(参看A/40/647第28-29页, A. 6号案件)。

D. 49. Luis Alejandro Espinoza González. 他在1987年3月3日于Concepción宣誓后所作出供述, 根据这项供述, 当天他在家遭到三名没有搜查令的穿便衣的个人的搜查, 后来他查出这些人是Huelpencillo警察局的警察。 在搜查期间他全家受到威胁。

D. 50. Jorge Mario Angulo González 和Renin Fidel peralta Veliz. 在1919-86号案件中等待出庭审判; 他们各自的律师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两份保护申请, 一份是代表Angulo González先生于1987年3月6日提出, 另一份是代表peralta Veliz先生于3月3日提出, 针对特别军事检察官3月3日下令再延长隔离拘留期提出上诉。 从1986年10月25日至11月24日, Angulo González先生遭到隔离监禁, 从1987年2月24日至3月3日, peralta Veliz先生第三次遭到隔离监禁, 并从3月10日起延长了隔离监禁。 记录证明, 1987年3月12日结束的延长隔离监禁期是作为惩罚他拒绝向特别军事检察官作证而实行的。

D. 51. Valdivia主教Alejandro Jiménez Lefebvre. 于1987年3月10日向Valdivia上诉法庭提出申请, 要求指派一名法官对教区办事处1987年3月6日清晨遭到身份不明人士强行进入偷窃信件和在上面作手脚一事进行调查。

D. 52. Jaime Ruperto Alarcón Soto 和另一人. 在1987年3月9日向Pedro Aguirre Cerda上诉法庭提出的一份防犯性保护申请中, 他们诉说曾于1987年3月8日遭到武装平民的拦阻, 并以金钱诱迫他们合作。

D. 53. Linares 主教 Carlos Camus Larenas. 在 1987 年 3 月 9 日在向 Talca 上诉法庭提出的一份防犯性保护申请中表示他受到人身恐吓及袭击其教堂房地的恐吓。 1987 年 3 月 9 日, 他在办事处发现匿名恐吓信。 申请书表示这种行为是一个称为罗兰多·马图斯突击队的杰作。 1986 年 12 月 17 日, 还代表 Linares 教区的工作人员向 Talca 上诉法庭提出了保护申请。 记录证明, 业已查明一批属于青年秘书处的青年人是这些威胁的发起者。

D. 54. Emma Olga Trujichett. 根据 1987 年 3 月 21 日他在 Concepcion 宣誓后作出的供述, 她家在 1987 年 3 月 9 日遭到便装的个人的突击搜查, 这些人曾经追查他的下落。 在此之前, 他在 1986 年 11 月被便衣拘留和带到一个秘密的拘留地点, 在那里受到盘问和毒打。

D. 55. Estanislao Alejandro Niedbalski 和其他两人. 1987 年 3 月 21 日以他们的名义向 Pedro Aguirre Cerda 上诉法庭提出了防犯性保护申请。 申请人表示, 3 月 18 日他们家遭到三名武装便衣的突击搜查, 这些人说属于国家情报中心, 可是没有出示搜查令。 他们在屋子上下搜查了一遍, 并向 Niedbalski 先生的岳母打听他的下落, 但他们无法得到所需的情报时, 威胁要带走她的孙女儿。

D. 57. Claudio Melino Donoso 和其他 23 人. (在 1797-86 号案件中候审)。 针对特别军事检察官 1987 年 3 月 17 日的宣布, 即被告将被带到该国北部, 看看可否重演有关事件, 1987 年 3 月 23 日以他们的名义提出了保护申请。 申请书表示, 这些措施对于从 1987 年 3 月 3 日起绝食抗议的被告人的健康会造成损害。

D. 58. Manuel Gajardo Negrete. 他在 1987 年 3 月 27 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了保护申请书, 理由是一项惩戒措施剥夺了他作为大都会教育科学大学的学生的身分, 他在 1987 年 3 月 24 日被开除出校。 申请书表示, 这是一项专横的行动, 而且剥夺了他辩护的权利。

D. 59. Armando Agüero Barria. 他在1987年4月1日向圣地亚哥第十刑事法庭提出控诉, 声称他在1987年3月25日在家中遭受枪伤, 一颗子弹穿过右脸从口部出来。控诉书表示, 子弹是由开着卡车随意放枪的士兵发射的。

D. 60. Nancy del Carmen Avila Moreno和其他五名妇女。她们自称为“政治犯”, 被关在Quillota的防犯性拘留中心。1987年3月28日以她们的名义向Valparaiso上诉法庭提出的请求保护书表示, 她们的居住条件不卫生、来访的客人受到骚扰、书信给作了手脚、有些甚至失去, 不准她们在手做的工艺品上贴上“政治犯制”的标签。

D. 61. Luisa Noemi Riveros Varas. 根据1987年4月2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的一份防犯性人身保护申请书(381-87号案件), 他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见La Bandera贫民区的居民时曾与教皇谈话。自4月4日以来, 他家受到行迹可疑的便衣的监视, 同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D. 62. Mario Mejías Huircán. 1987年5月4日他向圣地亚哥第十一刑事法庭提出控诉, 表示他在1987年5月1日遭到穿便装的个人从家里劫走, 强行把他推进车里并加以毒打。控诉书表示, 他代表La Bandera贫民区的居民参加了1987年4月2日约翰保罗二世出席的活动。1987年3月26日, 当特别报告员访问La Hermida贫民区时, 他又向特别报告员作证。

D. 63. Monica Patricia Marín Torres. 她以本人和家属的名义于1987年6月24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请求保护书。在1987年4月2日于国家体育场举行的仪式上她与约翰保罗二世谈话后, 她和她的丈夫受到盯梢和威胁, 迫使她于1987年5月6日申请保护。尽管得到了为期30天的司法保护, 但是威胁和跟踪继续下去, 因此, 她在6月24日提出了上述请求保护书。

D.64. Hilda Alicia Durán Zúñiga . 根据1987年5月14日向 Talca 上诉法庭提出的一份请求保护书, 她的家在5月12日遭到三名蒙上脸的男女的搜查, 他们对她进行毒打, 并盘问她有关她和她丈夫在 Temco 与约翰保罗二世谈话的情况。

D.65. Iais Alberto Moncada Vergara. 1987年5月19日以他的名义向 Pedro Aguirre Cerda 上诉法 庭提出请求保护书。 申请书表示, 他在1987年5月13日在家中遭到一名警察的威胁, 根据他母亲在5月8日向 San Miguel 第十刑事法庭作出的一份控诉, 在此之前警察还把他打伤。

D.66. Angela Emilia Berrios Tamayo. 她是维护妇女权利委员会执行秘书处的成员, 于1987年5月2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请求保护书, 她的申请书表示, 她收到了一封信, 其中提到 José Carrasco (参看 E/CN.4/1987/7, A.13号案件, 第9页) 以及她的一位表亲和她的女儿, 该信用“11-9”的代号签署, 这个代号可能是指“911突击队”。 她的亲戚在1987年5月5日也收到一些自称为警察的人打来的电话, 他们要找 Bárbar Berrios Tamayo 几天后, 有两个人打电话到她表亲工作的地方了解她的身体特征。

D.67. Édras Pinto Arroyo 和 Reinalda Pereira Plaza . 特别报告员已经报告过这宗据称失踪的案件(参看 E/CN.4/1987/7, 第22页, D.29号案件)。 1987年6月1日, 圣地亚哥上诉法庭决定撤销 Carlos Cerda 法官调查案件的诉讼, 这项决定是由取代应受到高等法院惩戒行动的 Aguirre Cerda 法官的 Silva 法官所裁定。 代表据称失踪人士家属的律师提出两项分开的上诉书, 设法撤销取消有关案件的诉讼的上诉法庭第四庭的裁决。 上诉书指出, 必须证明 Horacio Cepeda, Waldo Pizarro, Fernando Ortíz, Héctor Véliz, Lincoyan Berrios 和 Lisandro Cruz (其他据称已失踪的人士) 遭到劫持。 申请人要求高等法院撤销取消诉讼的决定, 在没有彻底查明真象之前继续进行调查。 在完成本报告时高

等法院尚未作出决定。

D.68. Julia Viviana Chávez González . 她向圣地亚哥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提出控诉, 表示她和其他3人在她居住的大楼内受到15名特种部队的警察的毒打。

D.69. Mario Edmundo Nieto Yañez 和其他7个人 (904-87号案件) 根据1987年6月17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的保护申请书, 在国家情报中心的官员于6月15日和16日进行的调查中他们受到拘留。有关的调查是根据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的检察官 Acevedo 先生签发的1402号调查令进行, 然而申请人却交由特别军事检察官Torres 处置, 由他下令将他们隔离监禁。

D.70. Carmen Hertz Cádiz . 根据1987年8月17日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的请求保护书, 在1987年7月和8月期间, 她日夜不断收到匿名电话。7月31日她受到一辆汽车的跟踪, 8月16日她发现自己的汽车有一个车轮给放了气、另一车轮遭割破。她是据称于1973年在 Calama遭到处决的律师兼新闻记者 Carlos Berger Guraltik 的遗孀。

D.71. José Francisco Silva Hidalgo . 根据他父亲1987年8月6日向 Pedro Aguirre Cerda 第六刑事法庭提出的证词, 涉嫌与侦探 Manuel Jesús Rodríguez Muñoz 的死亡有关、在8月3日遭到侦缉局的成员拘留的 Silva Hidalgo 先生, 在国家情报中心楼房停留的时间超过《宪法》所规定的时间, 没有交由主管的法院处理。1987年8月17日, 以 Silva Hidalgo 先生的名义向 Pedro Aguirre Cerda 上诉法庭提出保护申请书。申请书表示, 尽管 Pedro Aguirre Cerda 刑事法庭的法官依照 Silva Hidalgo 先生的父亲提出的申请向侦缉局发出指示, 可是并没有将 Silva Hidalgo 先生交由下令进行有关预审聆讯的法院—圣地亚哥第六刑事法庭处置。8月18日, 以 José Francisco Silva Hidalgo 和另外两人的名义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保护申请书。申请书 (1280-

87号案件)表示,8月7日将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主体交由特别军事检察官 Torres Silva 上校处置,他们经过5天隔离监禁之后获释,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控诉,并交由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处置。在那里他们就有警察 Leopoldo Toloza 中士死亡一事受到检察官 Acevedo 的盘问,可是在这种案件中并没有发现审判他们的证据。虽然如此, Acevedo 检察官以他们破坏《武器和炸药管制法》为理由将他们交付审判。8月17日,把他们交由第二军事法庭处置,并再次延长他们的隔离监禁。1987年8月20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控诉,理由是第三军事检察官办事处将他们交付审判已超过62小时,而且他们的隔离监禁可能无限期延长。关于声称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的情况,参看上文B.38号案件。

E. 获得正当审判和诉讼程序保证的权利

E.1. Juan Moreno Avila 和其他四人在1919—86号案件中交付审判。1986年12月16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了请求保护书。他们的律师在请求保护书中重申在本案件中成立一个特别检察官办事处和指派一名特别军事检察官是非法的。就这点向第二军事法庭提出的第一份申请书(参看E/CN.4/1987/7,第4页,E.2号案件)在1986年12月1日遭到否决。第二份请求书在1987年1月15日被否决。1987年2月26日,1919/86号案件几名被告人的律师向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提出一份申请书,要求监督处理有关案件的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法官和特别军事检察官 Torres Silva 的官方行为。他们又要求高等法院检察官监督以前的圣地亚哥公共监狱的业务,因为被告人声称受到歧视性待遇。1987年5月5日,在1919/86号、1917/86号和782/86号案件中代表 Juan Moreuo Avila 和其他八名被告的律师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一份纪律性控诉PR4263号,反对军事检察官 Torres Silva 将被告人转移到该国不同拘留中心的决定。该项控诉表示,“在这三宗案件中,被告人必须忍受长期的隔离监禁,下令采取这些极端措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种措施妨碍了法律专业的行使和侵犯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这项控诉在1987年7月8日遭到否决。既然如此,应当指出的是由5名法官

(占少数)赞成接受这项控诉,因为他们认为转移被告人妨碍了《宪法》第19(2)条所承认的合法辩护权。1987年7月13日提出了一项撤销该项裁定的申请。

E. 2. Vasily Carrillo Nova 和其他10人。 1919-86号、1917-86号和782-86号案件的被告人。1987年5月以他们的名义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一份纪律性控诉(834-87号案件),反对检察官 Torres Silva将被告人转移到该国不同拘留中心并下令将其他人隔离监禁在圣地亚哥监狱里的决定。该项控诉表示,1987年5月19日,Vasily Carrillo Nova 和 Victor Molina Donoso 与其他政治犯分开,被转移到南圣地亚哥第一号防范性拘留中心(即以前的监狱),和105名普通犯人关在一起,与其他政治犯完全隔绝。特别军事检察官涉嫌滥用《刑事诉讼法》第292条的规定,其中允许将同一宗案件中的有关被告人分开,但是要考虑到他们的性别、年龄和身份。该项控诉表示,实行这项规定应当符合诸如《宪法》第19(2)条等的宪法规则,其中表示任何当局不得任意确定差别”;第19(3)条,其中表示“必须一贯遵行合理和公平程序的保障”。

E. 3. Arnaldo Hernán Arenas Bejas。 在1919-86号案件中交付审判。1987年5月4日,在Pedro Aquirre Cerda 上诉法庭法官否决了关于指派一名民事法官调查1919-86号案件的事实的要求之后,他的律师对普通和军事的管辖权限提出问题。1987年6月22日,法庭接受了权限的问题(第三庭),推翻了Hernán Correa de la Cerda 法官的决定,并裁定有关的法官(Pedro Aquirre Cerda 法院的一名法官)有权处理1919-86号案件。1987年6月23日,司法部长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反对上述裁决并获得了一项“不变更令”。

E. 4. Mario Edmundo Nieto Yañez 和其他七人(90-4-87号案件)。 1987年6月17日,以他们的名义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了宪法权利保护令申请书。根据1987年8月20日向军事上诉法庭提出的申请书指出的

理由，军事检察官第三办事处1402号调查令造成了以下等非法行动：将身受重伤的 Santiago Montenegro Montenegro 隔离监禁31天；长期隔离监禁其他拘留者。上述两项行动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272条，其中规定隔离监禁不得超过5天。还有破坏2460号法令，即关于侦缉局的基本法令的情况，其中规定必须将被捕者送交下令拘捕的法庭，在有关案件中，是要送交军事检察官第三办事处，而不是送交特别军事检察官办事处。

F. 自由进出国境的权利

F. 1. 必须提出申请才能入境的464人的名单(A/41/719)从1987年1月至9月1日，被禁止进入智利国境的智利人名单大大缩短(参看E/CN/1987, 第24页, F. 1号案件), 人数减至上述数字。当局宣布将继续审查个别的案件。

F. 2. Edelmira Corina Avila López 和其他207名妇女。由于禁止他们进入国家领土，1987年3月以他们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宪法权利保护令申请1987年5月17日，政府公布了获准归国的人的名单，其中有57名妇女是申请书上要求宪法权利保护的人。因此，5月18日，撤销了这57名妇女的申请。1987年5月25日，第二上诉法庭允许了以105名流放妇女名义推出的宪法权利保护令申请。次日，高等法院第4庭一致通过了内政部要求的不变更令。1987年5月28日，高等法院第4庭一致批准内政部提出的上诉，即反对授权105名流放妇女入境的决定，因此，上诉裁定尚未生效。

F. 3. Vital del Carmen Ahumada Tello 和其他39名公会领袖。1987年5月22日，18个全国工会组织代表他们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宪法保护权利申请，反对禁止他们进入国境的非常法令。

F. 4. Reinaldo del Carmen Olivares Palma (宪法权利保护令633-87号案件)。根据有关记录，申请人回国的权利受到剥夺，原因是由于一些“情况，所有这些情况特别带有保密性质，由于法庭诉讼的公开性，不宜公布这些情况”。1987年8月3日律师Olivares先生要求高等法院指示内政部具体说明并证明有什么根据禁止而且继续禁止该申请人进入国境。

G. 行动自由权利

G. 1 Clodomiro Almeyda, Mireya Baltra, Julieta Campusano 这3个人不顾禁止他们入境的法令，于1987年进入智利。他们出席法庭的审判，法庭裁定他们绝对自由。内政部立即下令把他们行政流放到国家偏远地区，为期90天。在90天结束之后，两名妇女重新得到自由，可是Clodomiro Almeyda 受到下文说明的各种政府强制性的限制（见看下文H. 1号案件）。

H.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

H. 1 Clodomiro Almeyda Medina。1987年6月22日对他颁布了3项强制令：（一）向Copiapo上诉法庭提出，声称违反了《18015号法》（非法进入智利）；（二）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违反《18314号法》（鼓吹恐怖主义）；（三）向宪政法庭提出，因侵犯《宪法》第8条鼓吹极权性的学说或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学说。自1987年6月23日起，Almeyda 在圣地亚哥受到防范性拘留（以前的公共监狱的Capuchinos群房）。

H. 2 Francisco Herrerros。《河床》杂志编辑。根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资料，他受到国家情报中心的监视。1987年5月12日，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会发表了两份声明，在声明中对有关监视表示关注。

H. 3 Fortin Mapocho 报编辑Felipe Pozo Ruiz和该报新闻记者Gilberto Palacio。1987年5月29日，他们由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交付审判，罪名是侮辱武装部队，因为他们写了一篇题为“军事服务受审判”的文章。1987年6月2日，他们被转移到Capuchinos监狱的群房。1987年6月9日，军事上诉法庭向他们提供保释。

H. 4 Roberto Garretón和Mariana Allendes。为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 工作的律师。1987年5月6日，在军事检察官声称他们侮辱武装部队而向他们颁布了一项强制令之后，他们被传到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

作证。1987年6月，Roberto Garretón在此向第一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作证，谈及他就智利的“私人匪邦”的活动向Fortín Mapocho报提供的一次访问。1987年9月3日，他遭到军事检察官的起诉，并下令将他拘捕，次日他得到保释候审。

H. 5 Juan Pablo Cárdenas。《分析》杂志的主编。1987年6月，他被传到第二军事检察官办事处作证，因为他侮辱武装部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并在他的杂志上发表。在文章上署名的3人 Esteban Silva、Jamie Escobar 和 Jamie Martínez 也作了证。Juan Pablo Cárdenas 正在服刑：541天的夜间监禁；他因在《分析》杂志的社论中作出的评论侮辱共和国总统而在候审。

H. 6 Maria Oliva Monckeberg Pardo - 新闻记者联合会顾问和 Luis Eduardo Thayer Morel - 工会律师。根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资料，以他们的名义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了请求保护书。保护书指称，他们在1987年6月22日在家里接到电话，在电话中受到侮辱，生命受到威胁。1987年6月25日，他们在路上开动的汽车发动机起火。次日，他们在汽车经过机械工人检查之后获悉，起火是有人故意引起的。

H. 7 Marcelo Alejandro Zurita。教会拥有的广播电台“Radio la Voz de la Costa”的一名广播员。根据特别报告员所得的资料，1987年8月1日，Marcelo Alejandro 向 Osorno 刑事法庭提出控诉，表示他在1987年6月25日在上述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左臂遭到枪击。

H. 8 Emilio Filippi，《时代报》编辑；Ismael Llona，“Fortín Mapocho”报编辑；Juan Pablo Cárdenas，《分析》杂志编辑和 Marcelo Contreras，“APSI”杂志编辑。根据1987年7月22日由内政部对他们发出的、并向圣地亚哥上诉法庭提出的一份强制令，据称他们违反了1987年6月4日第6255号法令的规定，该项规定对新闻媒介实行各种限制。

他们的罪名是发表了宣布为非法和违反宪法的智利共产党的声明。政府又宣称将以触犯《宪法》第8条和第18号法令的罪名对下列在上述声明中签名的8个人发出一项强制令：Julietta Campusano、Mireya Baltra、Fanny Pol-larolo、Victor Galleguillos、Patricio Hales、Gonzalo Rovira、José Sanfuentes 和 Alejandro Yáñez)。

五、结论

76. 象第一次访问那样，特别报告员对智利的第二次访问得到了智利政府的合作，不但能够进行访问，还能使特别报告员能够在该国执行行动方案。可是，他确实感觉到官方人士对于他的第二次访问感到紧张，这是前次访问所没有察觉到的。当然，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访问时已经了解到访问是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批准的，因此，这是不能掩饰的，而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如此，这次访问的意见分歧要明显得多，在特别报告员在智利停留期间也是如此。这方面的一项事例是有关的一项意外事件：特别报告员开始在圣地亚哥工作的第一天首先访问了 Fresno 主教，然后会见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很坦白地告诉特别报告员他在公开言论中应当小心谨慎。他的话使特别报告员感到吃惊，而且心里很不好受；他把他的感受告诉了外交部长，表示根据协议，他不能容许对他的访问进行任何限制。

77. 其他类似的事件包括安排访问高等法院院长和访问时诸多拖延以及外交部的代表向高等法院院长 Retamal 先生提供预想不到的资料，表示特别报告员要求和他会见，以便就他向当地报纸表示智利司法不独立一事向他道歉。就在这一次事件中，特别报告员告诉 Retamal 先生说，他来此不是提供任何借口或道歉，并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他所说的在他报告中清楚地写出来，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

78. 对特别报告员向新闻界的发言作出的一些重要官方反应，特别是政府执政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的反应证明对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有很大的敌意。特别报告员接到外交部的要求，要他收回他对司法制度的谈话，这件事造成的紧张情况几乎使他的访问中断。为了挽回局面，特别报告员利用新闻记者提出的很多问题重申他的发言，澄清他以前就这方向新闻界的发言的来龙去脉。

79. 特别报告员认为第二次访问比第一次访问较差的另一个例子是内政部一名官员的参与他以及站在政府一边的 Carderon 大使、特别报告员及其同事设法审查政府执行了多少特别报告员在报告、尤其是最新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由于3名官员态度很不灵活以及无法理解特别报告员要达到什么目标，使工作陷于停顿，结果决定智利政府应在特别报告员访问之后向他提供他在这次失败的会见中所设法获得的资料。

80. 此外，对于1987年5月1日向贫民区领袖 Mario Mejias Hvircan 人身的尊严作出的严重打击，特别报告员不得不表示谴责，因为这项行动的明显意图是恐吓他（参看上文第四节D.62号案件）。当特别报告员在1987年3月26日访问 Lo Hermda 贫民区时，Mario Mejias 曾向他作证。

81. 除了上文指出的事件外，智利政府为特别报告员执行职务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即使是访问过后仍然继续这种合作，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感激。

82.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认识到，智利民主程序以及人权的保护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政府执行宪法有关规定的计划引起激烈辩论。政府已通过选举登记法以及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关于政党的基本法令。一种意见认为公民和政党均应登记，另一种则反对二者的登记。一般说来，辩论的中心在于登记是否能使目前的政治制度合法化。当然，还有第三种意见始终鼓吹的暴力手段解决该国的政治冲突，对他们而言，只要涉及选举都是应受谴责的。

83. 辩论的加剧是由于反对政权的各政党之间对于选举登记和参与公民投票的问题产生争论。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上述情况以及某一较温和的反对派政治领导人的意见：对于另一相关问题——是否该促成普选来更换政府，还是参与公民投票，日后再进行普选——他向特别报告员表示，在当时情况下，第二种途径才是可行的。

84. 关于选举登记和选举事务制度的第118,556号法令设立了一个选举事务处，由一名具有多年经验的官员担任处长，他的专业和个人资格使特别报告员感到印象深刻。当特别报告员访问时，选举事务处正在执行日常职务，至今为止该事务处的工作方面尚未接到任何控诉。

85. 上述法令目的在于办理不断进行的选举人公开登记，使他们能够参加过渡选举制度，首先是1989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一般而言，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法令载有必要的法律条文未保证具有合法投票资格的选举人办理适当登记，规定公民应采取必要步骤于适当时间进行登记，政府则提供必要的合作。特别报告员相信，他在下一章提出的有关此种登记程序的建议之一将会得到执行。

86. 智利所订立的过渡制度是为了举行1989年的公民投票，决定是否拟准政府执政委员会所提名担任共和国总统的人选，考虑到这一点，宪法中有关选务法庭组成以及与宪法有同等地位的关于选务法庭的基本法令的条文，据特别报告员的判断，均保证了适当的选举制度。

87. 为了使上述制度更加完善至少还需要两项重要的宪法性法律，以便尽早建立一个保障智利人权的民主政体。其中之一就是基本选举法令，据一个正式官方来源称，按照已公布的法案，此一选举法令将“综合国内传统的关于选举保障和程序的一整套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并确保选举和公民投票能够公正地举行。” 1987年7月底，特别报告员曾接获智利政府通知，表示执政委员会“知悉”这项法令，但在本报告编写之时，当局告知基本选举法令尚未生效，这种情况甚至有损于1989年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项法令载有对公民投票的规定，只是不包括举行的程序，以及目前与选举登记和选举事务制度有关的事项，这些也将适用于未来的公民投票。

88. 关于1989年的公民投票，特别报告员必须作出以下评论：

(a) 一如过去的报告所述，特别报告员很明白地表示赞成自由守法的定期选举制度，由若干政党或至少两个政党相互竞争（一党制——即 Sigmund Neumann 所指的“单一党”——是彻底的概念矛盾；一个政治组织当至少有在另一竞争性集团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政党。“论述某一比较性研究”）。

(b) 政府必须对1989年公民投票的目的尽速彻底表白其官方立场。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共和国总统1986年在康塞普西翁

和 Santa Juana 以及最近，于 1987 年 8 月在奇廉发表演说时所作的若干声明。最近一次，据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共和国总统表示 1989 年的公民投票不是一次选举，而是对当前政府的公众评议，换句话说，即对其政绩进行投票。特别报告员对于哥斯达黎加报章登载的这些向国际通讯社所报道的声明感到吃惊，要求智利政府通过智利驻圣约瑟大使馆加以澄清。大使馆以 1987 年 8 月 27 日在圣约瑟所发备忘录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共和国总统在奇廉发表演说时表示，‘建立’党政所需的时间为 16 年”，此外，“重要的不在于由谁来做，而在于达成目的”。因此，该国将举行一次公众评议，而非一次选举：对政府政绩的公众评议，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备忘录上还说，“智利充分了解即将举行的是一次总统公民投票而非选举。这是宪法的规定。日常所用的 ‘popular referendum’（公众评议）与公民投票是同义词”。备忘录表示，共和国总统在奇廉的演说遭到“断章取义”，或是“曲解”。无论如何，为了确保对智利人权的维护而言极端重要的此一事项能够永保澄清起见，政府最好是不怕重复地清楚表明，它认为公民投票不仅仅是对智利目前当政者的政绩进行的公众评议而已。

89. 终止智利公民流放的努力未曾间断。据智利当局的官方统计，1987 年 1 月至 9 月 1 日之间计有 2,854 名流放者获准返国；由于各种原因尚被禁止返国的流放者人数约为 464 人。但同一来源显示，其余个案将继续以现有审查程序来处理。

90. 特别报告员 1987 年 3 月第二次访问智利期间特别感到鼓舞的是内政部门人权事务咨询委员会的态度及其活动。咨询委员会不仅履行了当初交付给它的各项任务，而且还自动或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进行着额外工作。譬如说，今年五月间，它同本报告第三节提到的侦缉局订立了一项协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中赋予很大权力来保护因基本权利遭受任何侵犯而提出控诉的人。例如，为了调查一项控诉是否属实，委员会可能实际造访据报告发生非法胁迫或任意拘捕的地点，也可能出席与控诉有关的法庭审讯，以进行调查。

91. 另一项可喜的进展是政府决定不允许国家情报中心继续在该中心拘留任何人犯。国家情报中心今后必须将所有被拘留者移交侦缉局或警察部队。

9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与侦缉局、国家情报中心和警察部队之间订立了协定、允许该委员会定期视察各拘留中心，特别是防范性拘留中心，这是智利政府的一项积极行动，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重大成就。特别报告员在 1987 年 3 月访问期间同该委员会驻圣地亚哥代表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相信上述协定是有效的。但是，报告员最近获悉国家情报中心仍然在侦缉局内对被拘留者进行审问和虐待。实际上，国家情报中心的这种非法活动已依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侦缉局所订协议进行着调查——协议规定委员会可在 24 小时内会见被拘留者。

93. 由于宪法的过渡条款第 14 条——实际上它同宪法的多数条款同样地具有永久性——赋予行政部门极大的权利，智利的司法部门仍然受到严重限制，而不能独立行动。此外，各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内，面对此种权利的丧失而采取了屈从的态度。特别报告员认为，此一态度完全无助于改变现状，包括设法修改宪法以使智利的司法部门摆脱其有害的枷锁，而只能在它被迫而对现实之时更加束手无策。特别报告员第二次访问期间某一记者提出智利司法部门是否能独立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是给予否定的答复，并重述前几次报告中的话，包括建议法院改变态度，对政权作出某种反抗以便经由宪法和法律途径来改变现状。

94. 特别报告员在 1985 年 12 月初次访问智利时即深刻认识到智利司法部门的欠缺自由。当时，不仅是人权遭受某种侵犯人的辩护律师表示司法部门不够独立，接待了特别报告员的最高法院法官当各法官在报告员面前进行激烈辩论时也特别指出了法院的不够独立。

95. 有关智利司法部门不够独立的表示引起了骚动，特别报告员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原以为除了最高法院以外，政府高级官员也应表现较高程度的客观性，而他们却完全无视于事实。特别报告员并不想以此来谴责最高法院院长 Retamal 法官，但是这位著名的法学家并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批评，法官在报告员 1987 年 3 月访问期间，同他进行了长时间启发性的讨论。

96. 特别报告员在圣地亚哥的两所监狱中探访了一些被告，对于审问他们的特派军事检察官 Torres 印象深刻。所有被拘留者均表示检察官 Torres 对待他们异常严厉苛刻，欠缺公正这一点更不用说了。许多被他审问过的人对这一点十分明了，而不愿寻求其他法律上的解救办法。特别报告员同检察官 Torres 谈话时也体会到此种情况。他在执行职务时表现出不必要的热心、严酷和轻蔑，其偏见对他这样职位的官员而言是很不适当的。受审者被控告的罪行是极严重的妨害国家安全罪，例如企图暗杀共和国总统，但是检察官的不当行为不能以此为借口或作为理由。

97. 特别报告员感觉到警察部队如今可能愿意恢复其传统职责——过去曾为他们赢得智利人民的尊重。如果警察部队果真如此，而且永久采取这种态度，则他们对智利人权的维护将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报告员这样说当然不希望引起不实的幻想，但他也不愿意忽略一个重要情况，即他们所作的评论有可能促成尊重智利人权方面值得赞扬的行为。

98. 智利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无疑地是对于以下问题的看法趋于两个极端：智利的未来，特别是结束目前的政权，过渡到代议制民主，这种政体是和平但并非停滞的，进行逐步改革并有效实现使全人类基本尊严获得保障的一切自由。

99. 智利的极化现象反映于各种恶劣悲惨的公私暴力行为，尽管政府和私人组织，特别是天主教教会为减少或消除暴力采取了重大步骤，但此种暴力行为既未停止，也未显著减少。

100. 暴力行为中最为突出的是引致死亡和毁灭的恐怖主义，这种邪恶的反常行为打击了人道主义，恶意地阴谋煽动智利社会内部的冲突，企图吓阻那些致力于通过文明手段进行改革的人即各地宣扬代议制民主的人，或是企图扰乱那些作为法律秩序守卫者执行重要社会职务的人。特别报告员在 1987 年 3 月第二次访问智利期间直接与一些恐怖主义受害人，包括平民和警察进行了接触，对于此种破坏及其后果得到第一手资料。令人遗憾且不安的是，国内和国际上仅只宣传官方部队

或私人集团所犯暴行受害者的命运而忽略了上述恐怖主义受害人的不幸遭遇。

101. 一如本报告上文所述，特别报告员强烈谴责官方部队在调查危害公共秩序罪行，以及一般的违犯国家法律罪行时所施用的暴力，特别是国家情报中心负责拘留和审讯者的活动，引起非法强制甚至酷刑（按照智利刑法，更精确地说就是“施用酷刑”）。这种暴力行为严重侵害了所有的人的尊严，对于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工作所适用的文明标准也构成同样严重的侵害。

102. 另一种可悲且致命的暴力形式是由私人集团自行施加刑罚的恶劣做法，他们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从恐吓到残酷杀害，全都是匿名进行。此外，这些行为者似乎有信心在现有政治制度阴影之下的某些公共当局将不会给予惩罚。

103. 特别报告员认为，上述各种想法和态度的极化现象及其悲惨后果严重妨害了一种必需的工作，即目前政府当局和个别人士国内和国外以令人钦佩的不屈不挠精神设法协调各对立方面的努力，分化程度如果加深，将对智利的文明生活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特别报告员前几次报告中建议，此次报告再度建议立即采取措施，本着爱国心来终止暴力，一切暴力都是可悲的，不论其来源为何。特别报告员因而支持任何可以制止那些过度政治热诚的盲目行为的措施，当此类措施得到执行时，他便始终给予支持并建议执行，尽管他认识到执行过程可能会，有时必然会受到挫折，因为这些过程充满无数潜在的危险和错误，特别是当有关措施制订和最初执行时即存在缺陷。

104. 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负责维持公共安全秩序的三个主要机构之间所订的协定就是如此。根据可靠消息来源，特别报告员相信这些协议不仅逐步地加以改善，而且也得到智利最高政府当局的坚定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此种信念不仅来自前内政部长 Garcia 先生的态度，而且也在于现任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Fernandez 先生和 Carvajal 先生最近签署了一份通告，载有对各安全部队首长的明确命令，重申禁止对被拘留者施行胁迫或其他虐待行为，并表示政府将惩处违反此项禁令的人。特别报告员在前一次报告中曾指出有必要下达此种命令，

尽管当时的 Garcia 部长表示他已发出类似的通告，证明该国政府在此项极端敏感且重要的问题上显示出它的政治意愿。特别报告员认为，通过法律撤销国家情报中心在该中心看管被拘留的权力也是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发展，是防止被拘留者初步审问期间受到非法胁迫的一个措施。但是，特别报告员感到不安的是，最近有报道指出国家情报中心的人员在侦缉局的处所使用胁迫手段进行审问。

105. 特别报告员关切的另一事项为：据报一些危害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罪嫌犯和被拘留者的辩护律师（包括团结共济会的一些成员）曾遭受恐吓与威胁。特别报告员认为，这将导致被控告者丧失法律抗辩的权利，使保障适当法律程序的公认权利和做法遭受严重侵害。恐吓和威胁的对象已开始指向法官，特别是一些独立且专业性地揭露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法官。

106. 关于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要强调指出，政府亟需对所有人权罪行给予最大注意，与主管的司法当局合作检举并惩罚那些犯罪者。对于震惊智利社会，破坏该国和平工作的如下若干恐怖案件尤其应该如此：三名受害人喉管被割，两人被焚烧，无数的失踪，1986年9月的四宗暗杀以及1987年6月 Corpus Christi 12人死亡等案件。当然1986年9月企图暗杀共和国总统及其警卫的罪犯以及暗藏武器案件，特别报告员认为同样应按照上述适当法律程序原则加以处理，此外，对于数年来，直到最近仍然发生的各种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警察也应给予注意。1986年12月31日移徙问题政府间委员会（ICM）总部遭受袭击的事件应加以调查。

107. 特别报告员很关切智利新闻界的危险情势；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反政府人士所控制的在内，大多数在《宪法》第四十条被滥用的长期或胁迫下作业。该条容许在紧急状态下限制新闻自由，而目前仍然是所谓紧急状态。此外，传播媒介须受某些条款规定的限制，一些在其他国家不会入罪的批评被视为对武装部队或共和国总统的恶意侮辱。即令如此，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某些反对派出版物惯于使用尖锐辛辣的言词，有时更有丑化之嫌。在这方面，报告第四节记述在这一期间对新闻工作者的最重要审判，这是特别报告员所关切的。

108. 在1987年上半年没有经证实的新的失踪情事。然而，特别报告员继续指出，在仍待进行的对前几年发生的663个失踪情事的司法调查，几无进展。法官塞尔达对所呈报的1976年11月和12月的10个共产党领袖的失踪情事的调查，就是如此。

109. 虽然前文各段述及对人权的尊重方面的进展，特别报告员想提请注意他所接到的关于非常严重的人权违反情事的申诉。在这方面，报告第四节列出所述期间内最重要和证明文件最充足的申诉，像平常一样，1987年9月4日给该国政府的信将这些申诉附上，以供该国政府评论，但特别报告员目前并不因此而不能对这些申诉表示关切。他认为这些申诉看来都是真实的，如他以前的备忘录所载列的申诉一样，都没有得到妥善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如在等待政府的答复时无视呈报事件的严重性，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110. 特别报告员认为，两种紧急情况，即紧急情况和破坏法律与秩序的危险情况，特别是后者，受宪法临时条款第24条管辖，经常侵犯人权的行使。它们还妨碍了向真正民主过渡的正常程序，因为它们为当局随时滥施和任意干预、妨害公民自由，提供了基础。

111. 特别报告员泄气地指出他以前报告所批判的行政放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国政府又再度将它用作压迫自由的工具。

112. 特别报告员相信在保健方面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安全领域的变化，对最需要国家保护的最贫穷的群体是不利的。该国政府相信它所采取的措施能改善制度，但特别报告员在1987年3月访问智利期间采访过的人所表示的意见与政府迥异，他们提请注意新制度中妨害其权利的缺点。鉴于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递了申诉，看来该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可能有较多的了解，因为智利新闻界证实了特别报告员所转递的申诉，政府也能从新闻界得到消息。

113. 此外，在社会事项方面，特别报告员关切在1987年3月访问智利期间向其汇报的情况，即很多教师被解雇，在某些情况下是政治报复，而另一些情况是

将公立学校和中学变为私人所有的进程的一部分。解雇所造成的动乱使智利的社会局势更为恶化，有人向特别报告员描述劳工部门十分危急：这一情况似乎也影响到旅馆工人，因为关于这类工作的国际和当地规范均未获执行，这并不妨害1987年7月6日《官方日报》公布第18620号法案，该法案核准了看来足以制约劳工关系的劳工法。特别报告员迄今仍未听到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各方的反应。

114. 特别报告员重申以下的申诉：该国政府认为不宜在《官方日报》公布批准联合国1966年所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情况妨害了对智利人基本自由的保护。

115. 在第二次访问智利期间，报告员又听取了负责处理涉及尊重基本人权的主要案件的司法人员的申诉，即他们得不到政府安全部队人员的适当协助；这表明了政府主管当局对确定事实并不感兴趣。

116. 在积极方面，该国政府几个月前宣布军事法庭所审判的400个案件左右将移交民事法庭，以致辩护权不再受到军事法庭程序的严峻僵化的限制。然而，特别报告员忆起他所接到的申诉，即移交工作仍未进行，对在军事管辖下起诉和目前被拘留的人士适用的法律将是十分严酷的反恐怖主义法令。

117.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它不久将宣布签署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分别通过的《反对酷刑公约》如果真正作出宣布，将是朝向切实尊重被控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者的生命和身心完整的十分积极步骤，因为被控者会遭受或可能遭受不同程度的非法强迫。特别报告员相信如果真正签署了这些公约接着予以批准并且在《官方日报》上加以公布，则所称的政府为遏止严重损害人类尊严的陋习措施现正采取的措施将有所增加。

118. 智利的人权组织告诉特别报告员关于前任部长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的案件，并且向其提出关于阿尔梅达与法庭的问题的各个卷宗。特别报告员对这一案件给予特别注意，并且询问一名政府代表关于各种审判的情况。他获告所有事情都似乎显示目前正遵循适当的法律的程序，辩护律师，包括阿尔梅达自己，均获准行事，这将显示法庭正确地处理这一案件。特别报告员将密切注意这些审判。

11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对待印度安马普切和维利切少数民族的违反人权的申诉。他在1985年12月第一次访问智利时曾就马普切人问题进行审议，这次将再作审议，以及了解现正发生的事情。

120. “任命校长”的制度造成在智利大学（天主教大学除外，因其受到凡蒂冈与该政府之间的协议制约）有军人校长。这一制度现已废除，代之以由教育部自每所公立大学学界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择校长予以任命的过渡性制度。特别报告员认为这项改变是同他的一项建议相符合的，对智利民主化进程极为重要，尽管该国政府仍然干预这种应由大学界自由作出的任命。

六. 建 议

121.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指出他在以前报告和同该国政府主管当局的会谈中所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已付诸实施。

122. 然而，尚须做许多事情，才能明确无误地显示该国政府同特别报告员，也就是同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合作，最后导致保护智利人权的有效措施。

123. 特别报告员尤其建议迫切地通过和执行有关投票权的宪法基本规定，也就是建立一个促进共同福利和保护人权的代议民主制，这是特别报告员在他所有报告中一直坚持主张的。这些法令包括基本选举法和关于国会的基本法令。这些法令在看来是向代议民主制过渡时尤其是必要的。

124. 此外，关于表决权，特别报告员建议改善选举登记制，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指出，该国政府，特别是选举服务处主任胡安·伊格纳西奥·加西亚很愿意听取特别报告员的意见。特别报告员于1987年3月在圣地亚哥同加西亚先生会面，建议其向选举促进和培训中心谋求咨询意见。该中心的总部设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是总部也设在圣约瑟的美洲人权研究所的一个专门的、权力下放的分部。特别报告员获告加西亚先生将于1987年9月参加该中心所组织的课程之一。

125. 特别报告员也建议在智利举行的一切选举的选民登记在强制和免费的基础上按照将开始采用的制度进行组织，以便公民认识他们的公民权，这些权利间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和真正民主的存在是密切相关的，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智利人民的民族自决，即自由表达和真诚尊重的大众意愿的首要民主原则，之上的。

126. 特别报告员相信在前文结论所提的暴力案件获得解决，有罪者，不论贵贱，都得到适当的惩罚时，智利社会的和谐才得以恢复。

127. 特别报告员认为政府迄今采取的防止逼供和其他强迫性作法的措施，应继续予以密切监测。各种保安部队同红十字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应不断扩大。应密切注意诸如向特别报告员呈报的涉及国家情报局在调查警察的官房内进行逼供的事件，以便立即防止发生类似事件，并且确保关于禁止国家情报局把被拘留者关在其房地的法律获得遵守，从而防止使用任何非法的强迫手段对被拘留者进行审讯。

128. 关于被放逐者，特别报告员建议关于容许这些被迫在智利境外生活的人行使其权利回到智利的进程继续下去。他还认为应就“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名单采取行动，这一名单包括了一些在放逐期间由于庇难国法律规定不得不变为该国的国籍才能工作，因而不获准回到智利的智利人。无论如何，特别报告员认为该国政府应就这一事项采取行动，以便避免痛苦的误会。此外，必须妥善注意回归者在适应新情势，包括对其人权的严重威胁在内，所遭遇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建议对那些因个人安全受严重威胁不得不离开本国的智利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129. 智利司法部门必须超越一切形式主义，取得它曾一度享有的司法独立。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和高等法院迅速、积极地从事达成这一崇高目标。因此，该国政府促进改革现有的宪政和法律秩序是处置得宜的，这样法庭执法时不会受到妨碍。高等法院这方面应承担关于解释这一对其有拘束力的法令的职务，这一职务包括在个别情况下制定法律。在少数本可而且仍会造成先例的情况下，法院毅然对涉及宪法临时条款第24条的若干案件的有关事实情况作广义的解释，从而行使有利于有效维护人权的裁判权——这是司法部门的主要职务，高等法院已对该法令作出解

释。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高等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法院敢于超出其管辖职务范围的精通法律的裁决为无效。

130. 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尽其可能全力支持法庭调查向其呈报的违反人权情事，并且惩罚犯者。

131. 该国政府曾宣布打算将目前有待军事法庭审理的大量案件移交民事法庭，它必须迫切地落实。同样地，为了更能保护候审者的权利，建议该国政府尽早审查特设军事检查官托雷斯和布兰科的行动，同时就此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132. 由于特别报告员受到时间的限制，他以其他建议的方式，提议本报告“结论”一节的一些逻辑必然结果，但在这里没有作具体式尽详的阐述。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他必须明确地重申他在以前各报告中关于建立一个民主、代议的、多元、安定和偏重改革的政治制度的建议，这是确保尊重智利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权的最佳办法。为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实行普选制度以决定智利的政治前途以决定千万不能忘记的智利社会的生存本身。有一天智利采用了直接、普遍、不记名、定期的投票制度，就能预期每一智利公民的固有自由得到尊重和维护。
